

# 棍子扯文革

红卒要过河 著

∅ 不存在的出版社

# 说 明

---

本书原是网名为红卒要过河的同志发表在网络博客上的若干文章。或是表达讽刺，或是为了躲避言论审查，文中使用了各种黑话和俚语。此处大致列举了可能会引发读者疑惑的黑话以及它们的含义。含义十分明显的或已广为人知的词，如“神马”、“肿么”等，则不在此处列出。

1. **河蟹**：中国政府或中共
2. **姚小文员**：姚文元
3. **仲尼**：周恩来
4. **修养**：刘少奇
5. **矮子**：邓小平
6. **林妹妹**：林彪
7. **竹叶青**：叶剑英
8. **大刀**：彭德怀
9. **华不老实**：华国锋
10. **早饭**：造反
11. **党屎**：党史
12. **老龟命**：“老革命”，有一定资历的党员
13. **左逼**：形左实右的“左派”
14. **托猪**：鼓吹合法斗争路线的“托派”
15. **民主柿油**：民主自由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斗彭罗陆扬	10
第二章 对战工作组	20
第三章 批资反路线	32
第四章 工总司早饭	48
第五章 一月夺权与二月逆流	57
第六章 三支两军与王关受挫	69
第七章 猪队友、投机客和逍遥派	85
第八章 学生娃退场	95
第九章 毛组织撤退	103
第十章 清洗早饭派	119
第十一章 经济战线的斗争（一）	128
第十二章 经济战线的斗争（二）	141

# 前言

---

前面几篇博文已经对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的资无斗争做了简要叙述。从新税制事件开始资无首次正面交锋，经党内外反右、对战大跃进，再到三无计划、四清运动，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而从这历次战役来看，资方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无方则人缺将寡。虽然如此，或者说，恰恰因此，无先锋要奋力战斗，发出声音，召唤同类，壮大自己的队伍。经此数役，无方虽败多胜少，但遇有机会，还是进行了反击。形势发展到文革前夕，资无已成水火，一场席卷全国的广泛斗争是在所难免了。对此，资无双方都清楚的很。干柴已经遍地，一场大火所需要的就不过是一颗火苗而已。

这颗火苗，是由姚文元同志点的。火苗的名称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及性质，可以看本博所贴《姚文元究竟“文痞”在哪里》一文。就是这样一篇学术文章，遭到了彭真为代表的党阀和吴晗为代表的学阀的一致封杀。并且，恰恰是这伙人首先把姚文元这个小职员说成是学阀。在我们看来，姚职员的这篇文章是否有政治立场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他确实刺中了走资官学们的菊花。

于是双方围绕封杀与反封杀展开了斗争。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首，其余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四资一无，整出了个二月提纲来搅屎，政治局常委仲尼、修养、矮子出来为提网站台，立场分明。江青则联合张春桥扔出一份纪要予以反击，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文化领域，一直贯穿着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线，因此要对之加以斗争。老毛之前就已站队，为姚职员撑腰，此时更明确指出要打击走资黑线。接着迅速解散旧文革小组，建立新文革小组（此时组长为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发布五一六通知，成为文革指导性文件，文革正式拉开序幕。

随后，北大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央广播放，王（力）关（锋）曹（轶欧）加评论转发，各校学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高干子弟抢先出击，斗黑五类，搞血统论，整工农崽。同时，刘邓派出工作组，配合高干子弟，抢夺运动领导

权，镇压早饭学生。毛不满，回京后加以反击，贴出炮打大字报，开会发布十六条。撤出工作组，削弱刘修养。林妹妹（未暴露）积极介入。文革第一小段结束。

撤出工作组后，学生早饭派得到解放，马上展开广泛的反资运动。八月份开始，红卫兵运动便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工作组虽然撤离，高干子弟依然不忘搅屎，走资先锋们幕后指挥，挑动丫们斗工农崽子，镇压早饭派；斗死老虎，斗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红卫兵也是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早饭派和黑卫兵。官修党屎只提红卫兵，却不分资无，其居心当然一清二楚。

运动当然不会局限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十一月初，王洪文筹建工人早饭派组织工总司，遭到老龟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镇压。王带领工人搭火车赴京请愿，经安亭遭铁路局逼停。王带人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要求承认工总司合法性。仲尼召集资常委，决议否认工总司。张春桥赴上海处理，一屁股坐到工总司一边，承认其合法性。工业系统走资横行，工人早已心存不满，工人运动由此顺势展开。仲尼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搅屎。于是我们便看到，上层中央是资无激烈斗争（林妹妹还未暴露，此时算无一方），地方上同样如此，走资大员领着保守派工人组织斗早饭派，两派斗得不可开交。仲尼们为走资大员站台，江张姚力挺早饭派组织。

十二月，运动扩展到农村。各级走资还是那套搅屎手法：一手利用领导身份，两面三刀，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手用生产压革命。

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委“罢工”，王洪文领早饭派接手。这便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夺权。各地都出现走资老龟“罢工”情况。对此，竹叶青等一干走资军头极为痛恨，开会指责江张等人，搅起二月逆流。林妹妹欲揽军中大权，趁机借毛手打击这些军头，在军队发起反资斗争。仲尼们出手相救，保下一众老龟，暂避锋芒。

随之展开所谓军队支左，主要的两路军队（林妹妹与竹叶青为两派代表）皆为早饭派敌人，早饭派也由此遭受沉重打击。军队支左，保守派获得武力支援，率先对早饭派展开武斗。早饭派则加以反击，展开文攻武卫。这就是所谓的派性武斗大动荡。七二〇事件，老毛撤王关，保陈再道。老龟命展开疯狂进攻，早饭派处境更为困难。

六八年毛出手“维稳”，搞所谓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军头和干部多走

资，因此进入革委会的早饭骨干并无实权，也就顶个委员的名号点缀一下。各级权力依然掌握在资逼手里。七月底老毛觉得红卫兵表现不行，扛不起担子，于是把所谓五大领袖找去批了一通。紧接着就搞起了工宣队，往各高校派驻，早饭学生歇菜，被赶去上山下乡。江张们也受到老毛的斥责，无方进攻顿时弱了下来，党政军各路资逼缓过气来。接下来直到六九年四月的九大，老毛奉行所谓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方针。

九大过后，林妹妹实力登顶，逐渐暴露真面目。整个文革中，林妹妹是把阶级斗争庸俗化的头号推手，而这个庸俗化在理论上的“权威”则是陈伯达。神马四个伟大、神马一句顶一万句、神马忠字舞、神马早请示晚汇报、神马最伟大的天才，诸如此类，庸俗不堪。陈伯达则负责在理论上捧杀老毛。俩人这么一弄，把老毛搞成生活在云端的大神，怎么看怎么傻逼。哈哈，现在的各路左逼不也是如此么？所谓官方马克思主义，有大半是陈伯达的烂货。一开始老毛还觉得宣传一下，也是对早饭运动的鼓舞，但搞多了，完全成了形式主义，估计他自己都觉得被打扮成大神的样子有一种被耍的味道，于是对林陈表示了厌恶。当然，林妹妹的暴露，是通过一桩桩事件体现出来的。先是六九年十月的“第一个号令”，接着是更为严重的“主席之争”，这番争斗在七零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化。江张姚也意识到了林妹妹的居心，迅速与之决裂；仲尼们则抓住时机，展开反击。资无双方都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林彪的师爷陈伯达，搞了一通批陈整风。直至九一三之前的这一年中，林妹妹一派一直受着压制，丫们也一直不服。于是到了九一三彻底暴露，然后挂逼。

林妹妹挂逼，仲尼们窃喜。竹叶青们再无军中对手，力量的天平迅速倒向丫们一方。各路军头纷纷复出，矮子也是重见天日。七三年十大，走资重掌大权。丫们立刻展开进攻，狂掀批所谓极左的黑风。江张们也展开反击，指出仲尼是投降主义，爬行主义，是走资路线头子。这几顶帽子当然一个都没扣错，尤其是最后一顶，非仲尼莫属。但老毛没有再进攻，而是选择了撤退，批评江张。这被左逼们解读为对江张的保护。我们只能说，这个保护措施很蛋疼。九一三之后，老毛战斗力直线下滑，完全跟不上江张的节奏。

江张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力量对比的失衡，因此更迫切地需要选择进攻，而不是龟缩等死。因此，我们说，江张们是充满斗志的无产阶级战士。七四年展开批林批孔，江张们矛头直指仲尼。仲尼们“不卑不亢”，老毛继续撤退，严厉

批评江青。此后江张们便独立展开了对仲尼们的斗争。老毛多方掣肘，拒绝江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主要领导人，却把矮子放到第一副总理位上。矮子更是在七五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之四届全国人大上，资势力完胜，矮子开始接手仲尼工作。江张展开反击，发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攻势，接着把矛头指向仲尼一伙。老毛则继续掣肘四人，袒护矮子。五月政治局会上，老毛又大和稀泥，警告四人“要安定，要团结”，这番警告无疑拖了四人后腿。

由此，矮子更是顺风顺水地展开了全面整顿。所谓全面整顿，就是全面解放还在靠边站的资逼，全面为曾经靠边站的资逼翻案平反，全面镇压还在反抗的早饭派，全面严惩已经关押的早饭派。换个说法，就是全面建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壮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灭无产阶级文化艺术。

四人清楚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军队一直被各路资军头把持，林妹妹终究也是一丘之貉。丫挂逼之后，军中再无力量来威胁仲尼们。如此一来，四人更需要掌握武装。军队被竹叶青们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只能在民兵上想办法，这就是搞所谓的第二武装。老毛又出来责令解散早饭派组织的民兵指挥部，目的据说是稳舵大菊。

此后毛远新同志担任起老毛的联络员，积极传递矮子们的搅屎记录。这为极度衰弱的无先锋队注入了一丝活力，同时也唤起了老毛的斗志。矮子们死不悔改，日益猖狂，老毛于是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江青奋力主攻，群众也是积极响应。资逼们也动员起自己的“群众”进行搅屎，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后来的四五事件。四五中，仲尼被抬到了至尊的地位，老毛则受到攻击。老毛受到攻击，这在群众运动的标语中是未曾有过的。说这事没有矮子们的掺和，恐怕连鬼都不信。江张小毛也是准确地将此类比为匈牙利事件，老毛在无先锋“驱使”之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撤销了矮子的一切职务。但还是留了个尾巴：保留党籍。不久，老毛见了马克思。

七六年十月，华不老实联合竹叶青发动政变，四人被捕，标志文革结束。当然，镇压造反派，清理三种人的“扫尾”活动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政变的成功，意味着复辟的开始。而三种人被清，劳动力重新商品化，打破铁饭碗，

自由流动，则意味着资关系全面而彻底的复辟。

扯了这么大半天，到底神马是走资呢？走资有啥表现呢？走资的群众基础又在哪呢？从前面《仲尼搅屎录》系列一路看下来的博友应该能立即指出至少两点：一是以农业为幌子，压制重工业发展，并且在工业生产中维持资产阶级法权；二是在农业领域，鼓励小生产，维持农村的旧生产关系，阻碍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那么，在教育系统，学术领域呢？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行动上压制无产阶级的代表。文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在大的方面，走资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推行资的路线。而在基础的生产层面，同样存在着资无的斗争。前面《共产主义与计划》一文里指出过，社会主义不搞竞争，而是竞赛。竞赛本身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主义下也有很多老黄牛，老黄牛就是在跟别的工人竞争。竞争什么呢？不是奖状锦旗，而是管理国家、支配生产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在生产中推行竞争的，就是走资；在生产中推行竞赛，限制乃至逐步消除竞争的，就是走社。那些老黄牛们，自然就成了走资的群众基础。神马物质刺激、神马一长制，都是具体生产领域的资原则。对这些原则大加鼓励、大力推行的，就是走资；对这些原则严加限制，逐步取消，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走社。那么，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群众，自然就成了文革派或者说走社派的阶级基础。

有的人可能要说了，要是反对黄牛，那岂不是要反对雷锋？反对陈永贵？反对王进喜？左逼挺雷锋，挺陈永贵，挺王进喜，就是以为丫们只吃苦耐劳，勇于奉献，是黄牛，破除了私心；右逼损雷锋，损陈永贵，损王进喜，也是以为丫们吃苦耐劳，勇于奉献，很虚伪，违反了人性。他们忘了，雷锋也好，陈永贵也好，王进喜也好，他们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对待阶级敌人，雷锋毫不手软；对待阶级兄弟，雷锋热情如火。陈永贵也是如此。矮子上台之后，他依然像一块顽石一样阻挡在资逼们前进的道路上，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但是对于公社的社员，他就像亲人一样和善，关心爱护，同甘共苦。这岂是神马老黄牛之类可比？吴桂贤们才是资逼们前进道路上的助推器。而陈永贵这样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柱石。王进喜也是如此，何以叫铁人，难道不首先是因为其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么？可曾有听说他私底下偷偷学技术，和工友们搞竞争？他

---



难道不首先是分担工友们的任务，并鼓励大家共同建设自己的事业？他难道不是身先士卒，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这难道不是高扬的社会主义精神？难道不是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这和劳模白专岂止是天壤之别！

正是在各个领域都存在阶级矛盾，所以火苗一放，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便风起云涌。这根本不是哪个人，乃至哪几个人说发动便能发动的。哪个人或哪几个人只能选择站队，哪个人或哪几个人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力量来投入到战斗当中。所处位置越高，掌握力量越大，影响也会越大；即便如此，也不存在能左右整个阶级斗争大局的个人。相反，个人的成败，倒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大局。同样，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中，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没有谁能客观中立，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对于我们来说，读史最重要的永远是积攒斗争经验。不仅是我们的前辈的斗争经验，还有我们敌人的斗争手段，都要琢磨、分析、积累。因此，我们必须代入具体情境当中，去体验斗争。我们根本上反对所谓旁观者清的庸俗论调，我们坚持认为当局者明。如果不代入历史之中去加以把握，我们将根本无法获得鲜活的斗争经验，无法提升自己的阶级觉悟，无法增进自己的思想认识。

设想你是个小文员，你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如果你看到某学术权威鼓吹封建统治的文章，你要不要写文章反驳？如果你跟某学术权威“商榷”的文章被大力封杀，你是神马感受？非但如此，你还要被扣上一顶学阀的帽子，你又是神马感受？这难道不是压迫？如有机会，你要不要反抗？你要怎么反抗？如果有大官说对这个学术权威表示支持，又有人对这个学术权威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

设想你是个学生，你爹妈就是个普通工人。如果你和高干子弟一起上学，被他们打成黑五类，关小房子，搞体罚。这难道不是压迫？如有机会，你要不要反抗？你要怎么反抗？然后进来一拨人，和高干子弟一伙，联起手来欺负你，你要不要反抗？如果有大官说对他们表示支持，又有人对他们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

设想你是个普通教师，如果你和大叫兽大文人一起执教。他们收入高出你一大截，成天吃香喝辣，又一副高高在上的鸟样，搞得地球离了他们就要停转，世界离了他们就要崩塌似的；丫们时不时给你穿小鞋，还成天发表些个烂俗的言论。这是不是压迫？如有机会，你要不要反抗？你要怎么反抗？如果有大官

说对他们表示支持，又有人对他们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

设想你是个普通工人，如果厂长捏着你的经济根子，你不顺从他，他就扣你工资。你身边有个劳模，总是偷偷学技术，加班加点干，搞得大家都很累，丫学了技术又不跟人分享，然后跪舔厂长上位。你想抽点时间多和工友们一起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厂长说生产高于一切，你得多劳动。丫然后搬出劳模来压你。你对此怎么看？你要怎么做？如果有大官说对他们表示支持，又有人对他们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

设想你是个临时工，设想你是个公社社员，设想你是个赤脚医生，设想……

一旦代入其中，冲突难道不是立马鲜活地展现在眼前么？你但凡是正常人，难道不应该立马选择站队，进行斗争么？该怎么做，不是很清楚了么？

如此一来，文革的主线不是很清楚了么？不就是各领域广泛展开的阶级斗争么？而这个斗争不是又在上面集中表现为先锋队之间的斗争么？一如既往地，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也会发生争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不也是正常的么？党政资整知识分子，不就是资内部斗争么？林妹妹斗仲尼们，不也是走资派内部的斗争么？早饭派内部也斗争，保守派内部也斗争，走资派压完早饭派也压保守派。这些副线穿插在资无阶级斗争的主线当中，我们若不擦亮眼睛，就会迷失于其中。

那么，文革是不是权力斗争呢？我们说，任何阶级斗争都一定包含着权力斗争，因为阶级斗争就是为了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为了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为了建立并巩固资产阶级的专政。要专政，却不搞权力斗争，这纯属左逼的意淫。但是，阶级斗争又不是单纯个人权力的斗争，而是服务于整个阶级利益的权力斗争。帝王权术、宫廷内斗，这是右逼对于文革的意淫。

至此，我们已大致描述了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详细的叙述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不过，关于文革是神马，还有很多奇葩的回答，我们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列于下面：

- A. “一线、二线”、棋局论、桥牌论、阴毛论、帝王权术、宫廷内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官僚权贵复辟；



- B.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 C. 某人心血来潮，利用偶像崇拜，个人迷信，凭一己之力搞的“伟大试错”；
- D. 毛的佛性，圣人性，发动文革；中国人性国民性不到位，“超前了五十年”，“人民理解不了而失败”。

很多新老左逼们选的是 A，将河蟹和封建王朝看成一体，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一体。而对“官僚”怪物表示普遍不满的右逼，选的也是 A。在这个选项里，老左逼具有新左逼所没有的优势：信息！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老的文革秘史，女皇密闻，于是陆续“高密级”的评书继续连播，飞砂走石继续大战卯金刀。

河蟹党史，党代会上通过的是 B；

选 C 的有亲历者、参与者如周泉纓；选 C 的还有孔老二传人，当代衍圣公，文革过来人。

某些体制外世外高人们，不世出的奇人们，求供养的高僧大德们，选 D。他们都不约而同在“入定”中看到了毛的真身，然后传道给凡夫俗子普通信众们：毛是大菩萨，发动文革是舍身饲虎，可惜人性的丑陋导致文革失败。

“朋友”们也都照照镜子，你们选的是哪一个？之所以“朋友”加了引号，是一些小资左逼，“好人”误以为和俺们是同路人。真是笑话！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唯无独革的年代。资左粉丝怎么会成为无的同路人？莫非河蟹还是太封建？向往无压迫的自由、向往清官好老板的资左，可以和无再续前缘，重新共舞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2.0？在列宁“新经济政策” 3.0 里缠绵？

左逼喜欢穿越，经常引用老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话来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老毛。下面两句是热心网友回复中经常引用的，俺就一并回答吧！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看待阴毛论，河蟹的资本主义属性，清官好老板，本身就能反应自身的立场屁股在哪里。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



少的。”有人说一二线城市都是小资了，即便有革命，也必将是小资主导的。小资的经济依附性和政治短视性，认为经济和政治是两个独立的而不是一回事，注定他们是个资无对抗大潮中找不着北的可怜虫。嘟嘟不是说过嘛：反左压迫，反右剥削！

阶级斗争很远吗？要知道：一切历史，皆为现实。现在人们的身边无时不刻没有阶级斗争：上班前背微笑服务语录有没有？考勤绩效有没有？加班加点有没有？小头目请客吃饭有没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有没有？如此种种，不就是身边的阶级斗争么？带着对这些斗争的体会，来看看文革中的斗争，一定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场景，捕获到很多真切的信息。



# 第一章 斗彭罗陆扬

前面一篇博文简述了一下文革的线索，本文将对资无双方在姚小文员发表批判文章到彭罗陆杨事件期间展开的斗争做一番描述。

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河蟹党屎》）

（看过前面周搅屎系列博文的博友恐怕都知道中宣部和文化部是些神马部门，是神马人在管事。六二年的时候江青就敏锐地发现了《海瑞罢官》的屎，而她要求停演此剧的建议愣是被中宣部、文化部的党阀学阀们给顶了回去。六四年康生同志接着进攻，直指吴晗菊花：为大刀辩护，搅庐山的屎。大刀的主张是神马，庐山会议是肿么一回事，请参看本博《仲尼搅屎录（八）》。江青很清楚，帝都都是党阀学阀的大粪池，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帝都肯定搞不成批评文章的写作。还是上海革命基础好，于是明智地跑到上海拉人干事。多亏了老柯主政上海的时候工作做的好，为无留下这个宝贵的革命基地。）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

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河蟹党屎》）

（哈哈，海瑞不就是为小地主喊话的么？神马退田，不就是小地主要田么？那么，在人民公社运动里，谁嚷嚷要田呢？主要的不就是原先的富农们么？不就是丫们搞单干最积极么？海瑞要田地骂皇帝被罢了官，大刀反公社骂中央也被罢了官，吴晗出来为海瑞喊冤，不就是为大刀喊冤么？实质不还是为单干辩护么？不还是给公社运动泼污水么？在无专政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毒草，难道叔还能忍么？）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河蟹党屎》）

（看姚文，绝对是一篇证据充足、论理充分、立场坚定的学术文章，倒是吴晗不学无术，搞得全是垃圾玩意。这样的批判竟然就成了“陷人于罪”！“进步知识分子”们完全可以把观点摆出来，把文章发出来，大家切磋切磋嘛。咋屁都不放一个，就寒心了呢？）

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河蟹党屎》）

（这么明晃晃的封杀，白痴都能看出来是咋回事了。知识分子们是肿么了，这么害怕“异己之见”？你们这么流弊，学术功底这么强悍，完全可以写文来批嘛。中宣部、文化部都为你们站台，你们还跟个娘们似的躲到后面放冷箭，咱都替你们害臊呢。老毛看不下去了，直接点了北京市委的名，爆了彭真的菊。）

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年11月30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

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河蟹党屎》）

（老毛发火了，不好硬顶，还是要敷衍一下。封杀不行，那就掺沙子。不能只转发不评论，要加按语。加按语就是消毒：仅限学术讨论啊，莫谈国事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河蟹党屎》）

（老毛表示知识分子们太矫情，跟这帮不学无术的人讨论学术很蛋疼。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好了。吴晗妥妥的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神马学术观点问题。吴晗剧中表现的阶级立场非常明确，后续对姚文元的封杀和污蔑更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恶劣行为。）

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河蟹党屎》）

（此时的文革小组就是彭真的天下，弄到文革小组讨论，不就是让彭真的人来讨论么？当事人规避原则去哪了？公平公正还有保障么？所谓至于“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不就是以权压人么？前面不还说学术讨论么？肿么还要置于党中央领导下？谁的党中央？）

“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

“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河蟹党屎》）

（哈哈，大党阀大学阀也撒起娇来，说姚小文员是学阀，以势压人，还有比这更搞笑的么？再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肿么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呢？）

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河蟹党屎》）

（嘿嘿，这就是彭真说的党中央：刘修养、周仲尼、陈老龟、邓矮子、陶铸……哈哈，常委老毛正好不在北京。）

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河蟹党屎》）

（彭真们既然用各级党政机关来搅屎，那无的斗争对象当然也不能仅限于学阀，而要扩大到这些党阀上来。）

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河蟹党屎》）

（江青一针见血，老毛明确站队。）

江青的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河蟹党屎》）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



氛。（《毛泽东传》）

（不到2个月时间，中央先后发了两个文件，二月提纲对部队文艺工作会谈座谈会纪要，针尖对麦芒。阶级斗争都是阳谋，你发提纲，我发纪要，都是中央开会通过的正式文件。意见分歧公开，那就是让全党都知道，然后开始站队，进行斗争嘛。身处中层基层的党员干部们该肿么办？如果我是文豪，大师，专家，我一定支持刘；如果我是受他们压制的普通文员职员，我举双手欢迎毛！）

3月17日至20日，毛在杭州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河蟹党屎》）

（广泛，意味着双方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双方都代表各自的“群众”，你站哪一头呢？）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传》）

（哈哈，中宣部是“阎王殿”，说的不就是被资产阶级党阀学阀掌了权，死死压着无权无势却要革命的“小鬼”们么？）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传》）

（这个“地方”，也得看是哪一级的“地方”。如果是省地一级，那老毛还

是洗洗睡吧。丫们基本都是牛魔王，几乎就没有孙悟空嘛。)

4月9日至12日，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传达了毛3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毛泽东传》）

（斗争一个小回合结束，无方小胜。但还需要继续推进。）

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河蟹党屎》）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毛泽东传》）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毛泽东传》）

（既然阶级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那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局限在神马文化领域。文革可不是神马文艺革命，而是贯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阶级斗争。把文革简单理解成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这纯属知识分子的狭隘想象。吴晗明显“朝里有人”，那就是各路常委撑腰嘛。所以斗争不可能局限于吴晗。彭真跳得最高，那就先拿彭真下手。不过，我们可别忘了仲尼先生哦。走资的带头大哥，此时还如黑幕一样挂在斗争舞台的后方。）

1965年11月10日，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诬陷。（《河蟹党屎》）



（当然啦，站在河蟹党立场，杨是好兄弟，好哥们儿，马前卒，顶缸的！毛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杨都随时关注，转发，私信给资路线代理人周刘邓。哈哈，原来这就是杨尚昆的“正常工作”。也是，丫们既然要搅无的屎，那么不让无正常工作，就是丫们的正常工作。）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康一民是仲尼的机要秘书，介个，俺们不禁浮想联翩。后面我们会看到，凡是当着或当过仲尼秘书，尤其是秘书头子的人，无一不是坚定的走资分子。河蟹不是出了党纪，说秘书犯事，主子要担责任么？肿么那时候的党纪还不如河蟹呢？丫们买窃听器这回事，连公安部长谢富治都不知道，哈哈，行动够隐秘啊。对杨尚昆的处分又为毛拖了好久呢？谁在保护他？杨尚昆这种级别的，谁有能力保护呢？政治局分明不把老毛放在眼里嘛。到最后，对杨尚昆的处分也不过就是降个职而已嘛，还是不妨碍老杨吃香喝辣，有机会还是要东山再起，重入中南海的嘛。）

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回忆江青同志》）

（哈哈，堂堂一把手被搞得心神不宁，有家不能回。左逼们不是吹嘘老毛

是万能大神么?)

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河蟹党屎》)

(有一种弱爆了的小资想法，认为军队应该国家化，才能代表民意。瞧瞧你们的先锋队，资路线代表人物刘邓们掌控了党和政府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军队的控制。倒了彭海瑞，就再扶植一个罗海瑞嘛！当初搞彭海瑞，林妹妹也是出了力的。这会儿林妹妹又积极跳出来，为控制军队展开了对罗海瑞的批判。《前言》里已经说过，这属于走资的内部斗争。但内部斗争也可以是很激烈，甚至你死我活的。林妹妹当然不是河蟹党的自己人，所以丫虽然同样走资，同属极右，却还是被河蟹党屎归入极左，和江青们绑在一起。总有些白痴抱怨河蟹阉割党史，掩盖真相。只能说这些人智商太低，你都知道了河蟹这副德行，又知道了河蟹的鲜明立场，那你就反推出来那些所谓被掩盖了的真相嘛。其实河蟹党屎是越来越好了，屎料越来越多了，俺们认为这些屎料是可靠的，但俺们的立场与河蟹完全对立，所以对同一个事实的评价自然也是截然对立的。河蟹所赞美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不过，河蟹所批判的人，却不一定是我们的同志。比如林妹妹这样的，陈伯达这样的，那就不是神马朋友，而同样是敌人。在有共同敌人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合作一下。这就是文革前期文革派和林妹妹的关系。但是，俺们一直强调要以我为主，所以无先锋要在林妹妹和其他资军头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加紧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两伙敌人斗完之后就是无的末日。根本木有神马统一战线可言，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的队伍才是王道。林妹妹们在上面联合文革派搞资军头的时候，照样没忘了在下面搞早饭派，这就是丫们斗争意识清醒的表现。)

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河蟹党屎》)

(《前言》里说过林妹妹是庸俗化阶级斗争、马列毛主义的首要推手。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神马马列顶峰、神马最高最活、神马最高指示、神马句句真理、神马一句顶一万句，都是空洞无物的玩意儿。不过，正是因为空，所以也就可以随便理解，然后“活学活用”。林妹妹们当然可以打着这些旗号为自

己的斗争洗白，底下的各级官员、乃至各路群众，照样可以各取所需嘛。同样，仲尼们也是可以天天嘴里万岁，暗地使劲放箭的嘛。反正，谁都不是傻子。）

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河蟹党屎》）

（罗海瑞斗争经验不足，在林妹妹风头正劲的时候出来对着干，还是明着干，还连带把老毛也搅进来，这就属于要当炮灰的节奏了。不过，还好后台硬，丫只要保下来命，就总有复出的机会。保命还是容易的嘛，老毛一直念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嘛。被斗一斗，日后翻盘了那都是资历、是战功。那么，说了半天，罗海瑞怎么就是军中的资呢？俺们不搞诛心之论，还是得按他实实在在的行为表现来判断。这不仅是俺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是对待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态度。我们只能根据言行去判断立场嘛。之所以说罗海瑞是资，因为丫在军中推行的政策方针是资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求军队不仅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还要以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组织，对军队推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老毛所说的政治挂帅。那么，罗海瑞是怎么做的呢？丫一天到晚搞神马军事大比武，无限拔高将领的地位，无限推崇武器的作用，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嗤之以鼻，把士兵当成单纯的战争工具。神马单纯军事主义、神马唯武器论、神马士兵工具论，丫简直是集反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之大成。这些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批烂批臭的玩意儿，被罗海瑞一个不落地捡了回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推行无产阶级原则，不推进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走资！在罗海瑞这样的原则下治出来的军队，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么？无产阶级的军队，一定是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军队，其组织方式，内部关系，也一定是遵照社会主义原则的。没有神马单纯的军事组织，任何军事组织，都承载着这种或那种社会关系，体现着这种或那种阶级利益。因此，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却允许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存在，这不是荒天下之大谬么？这也是为神马后来林妹妹暴露出资分子的真面目时，老毛会如此悲痛：尼玛军中尽是走资派，无专政还搞个毛！张春桥同志后来上到总政主任的位置，算是为无占到一个军中的位置，但军委大多数还是资，所以发挥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不过，聊胜于无嘛。俺们就是要锱铢必较。坑就在那里，你不占，敌人就会去占。）

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可以看出，干掉一批走资分子后，顶上来的还是走资分子：走资分子陶铸顶了走资分子陆定一，走资分子叶剑英顶了走资分子罗和杨，走资分子李雪峰顶了走资分子彭真。无先锋们的斗争，还是任重而道远咧。）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主攻，拿下彭陆，林妹妹助力，干掉罗杨。不过，就屎料来看，虽然提及上下都展开激烈的斗争，但并没有具体指出来有哪些群众性的运动。因此我们看到的还是先锋队之间的斗争。其次，彭罗陆杨虽然下台了，但替而代之的依然是走资分子，所以无先锋们还需要继续斗争。从无方这一阶段的进攻来看，老毛的斗志还是相当坚定，整体的斗争也是驾轻就熟。老毛总结当时的力量对比：丫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在军队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发动群众，对他们展开斗争，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不过，老毛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只是对丫们降职处理，而不是开除党籍，终结政治生命，更没有终结丫们的自然生命。



## 第二章 对战工作组

前文谈到姚小文员的火苗点起了文革的大火。火势从文化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阎王殿被掀倒，大铁桶被踢翻。不过，代替一座阎王殿是阎王殿一座，代替一个铁桶的是铁桶一个。可喜之处在于中央文革改组，无力量占据主导，因此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斗争先是围绕对北京市委的政治批判继续展开。但学校革命师生出来早饭，群众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抓准时机，迅速站队，大力支持并鼓励师生的早饭运动。但走资派立即反击，并掌握了斗争主动权，先是幕后指挥高干崽子们在学校里搅屎，斗学生，斗老师，也斗自个儿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早饭师生出来反抗，贴大字报。走资派反应迅速，派出工作组，名为维稳，实为镇压。老毛见状不妙，立即展开反击。早饭群众也是奋力抗争。两相合击，取得战果，工作组被撤销。老毛对此进行反思，认为派工作组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河蟹党屎》）

（五一六通知发布，资无大战正式开启。）

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河蟹党屎》）

（老毛深思熟虑，制定斗争纲领，亲笔加写的段落反映了老毛对当时阶级矛盾、党内走资、政治形势等的清醒认识。说“盗窃中央的名义”说明老毛还没有把矛头指向修养仲尼们。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相对修养仲尼们来说，彭真

也只是个小将。当时“中央”可是对二月提纲加以了肯定的，由此才能发到全党。）

“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河蟹党屎》）

（目标很明确：清洗各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各领域的领导权。所谓清洗，一是降职，二是免职，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夺回被其所窃取的领导权。因此，清洗并不包括剥夺政治生命，更不包括剥夺自然生命。老毛还是想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套路。）

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河蟹党屎》）

（被识破的有彭大刀、彭罗陆杨等，没有被识破的呢？比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虽然这次会议由刘修养主持，但这个赫鲁晓夫显然就是指他。想想刘修养念这一段时候的场景，也是颇有喜感。不过，据戚本禹的说法，刘少奇把朱德给说成了赫鲁晓夫：“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回忆江青同志》）话说回来，在俺们看来，刘修养不可怕，因为他斗争技巧比较差劲，容易识破，容易剿灭。可怕的是仲尼这样的人，资产阶级



立场坚定不移，斗争技巧炉火纯青，政治工作行云流水，保资护修手段高明。还有邓矮子这样的，处低谷而不气馁，有机会就搅屎，能屈又能伸，能上又能下。我们号召无产分子们向仲尼和矮子这样的资产阶级敌人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阶级立场，学习他们坚韧的斗争意志，学习他们坚决的斗争手段，学习他们耐心的政治工作，学习他们审慎的斗争态度，学习他们高明的阳奉阴违。)

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河蟹党屎》）

（这些判断，无疑是有着广泛的现实情况做基础的。从建国以来资无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个时候，老毛已经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层。最大的走资力量就在中央，那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领导层出走资，那肯定看过《仲尼搅屎录》系列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个司令部都有哪些人，老大又是谁，最危险的司令是谁。修养跳得比较高，搅屎活动搞得太明目张胆，所以早早被老毛盯上，时机一到，就被干掉。仲尼们则是阳奉阴违，明推暗阻，各种搅屎都有很好的借口。我们在资社会下搅屎，也得向仲尼们学习，用阳谋，那就得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学会打着蓝旗反蓝旗，用老板的手堵老板的嘴；耍阴谋，那就得拉帮结伙暗地里搞破坏，砸钉子挖墙角，保密工作要做好。那些脸上刻着革命二字的，分分钟就会被专政。这样的人，只会成为无产战士们的猪队友。我们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河蟹党屎》）

（林妹妹不失时机地站出来表态。我们认为，这个“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好。林妹妹用老毛来打鬼，老毛也可以用林妹妹来除魔嘛，有合作的基础，那就合作一把。）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河蟹党屎》）

（组长是林妹妹的人，其余皆为无的人。不过，此时林妹妹及陈伯达还是和无保持着合作关系的。因此，原先是资镇压无声音的工具，现在成为无的工具！其性质当然是完全不同嘛。不过，话说回来，无也就是在舆论宣传领域算是占了上风。）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河蟹党屎》）

（既然掌握了自己的理论宣传工具，那就开足火力，进行战斗。看看邓拓和廖沫沙们的玩意儿吧，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垃圾文艺。各种明讥暗讽，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种插科打诨，宣传小资意识形态；各种附庸风雅，鼓吹封建官僚的所谓艺术旨趣。一个书记处书记，一个统战部部长，岂是一般的知识分

子？党的领导干部带头攻击社会主义，宣传小资思想，难道不该批判？不该拿下？至于文化界，俺们就呵呵了。在仲尼们的细心关照下，文化界可是一直滋润得很呢。端工农的碗，吃工农的饭，砸工农的锅，说的就是这帮子人。）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河蟹党屎》）

（哈哈，高级干部！问题首先不就是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么？丫们表示很难接受，不正是处于丫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么？老毛感受到了来自丫们的强大阻力，因此认识到简单的搞搞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了。那么，接下来，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月25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河蟹党屎》）

（阶级矛盾无处不在，群众基础早已就绪，资无斗争普遍存在，上到庙堂深处，下到课堂厂房，干柴遍地，星火燎原。仲尼又一次拿面子来搅屎。有留学生的地方就不能搞阶级斗争？还记得仲尼在成都的那次表现么？那时，仲尼因为有外宾在场，就没有对某社亩产十万斤的标语提出批评。外宾、留学生，在仲尼眼里，全是神马民族面子，完全没有一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嘛。早饭群众可不吃这一套，拿民族面子来压我们？想得美。对无产战士来说，永远是阶级利益第一。留学生支持早饭学生，我们照样欢迎得很。留学生来贴党阀学阀的大字报，我们支持的很。还记得我们在《前言》里提的那几个“设想”么？现在就是了。设想你是个普通教师，如果你和大叫兽大文人一起执教。他们收入高出你一大截，成天吃香喝辣，又一副高高在上的鸟样，搞得地球离了他们就要停转，世界离了他们就要崩塌似的；丫们时不时给你穿小鞋，还成天发表些个烂俗的言论。这是不是压迫？如有机会，你要不要反抗？你要怎么反抗？如果有大官说对他们表示支持，又有人对他们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仲

尼们说他们批不得，你怎么看？你对仲尼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6月1日晚，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河蟹党屎》）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孔老二现在又借尸还魂了。当代衍圣公，吃喝抗日，旅游锄奸，网站致富，筹款敛财，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封建社会穿越到了现代化帝国，堂而皇之成为老板全面麻痹苦逼的工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河蟹党屎》）

（联想起5月15日首都工作组保卫安全，和文革小组换血，毛在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没有搞阴谋袭击，定点清除掉，而是公开社论大鸣大放。对比一下10年后资路线的秘密反扑，秘密审判，不换思想就换人。他们为什么心虚？因为他们和所有的老板都一样有着共同的噩梦：一旦无再觉醒，就不会只是文革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传》）

（哈哈，学生起来了，学校党组织受不鸟了，不干了。）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传》）

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代行党委职权”，对“文革进行领导”。（《河蟹党屎》）



（此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老龟命李雪峰，第二书记是老龟命吴德。北京市委反应很快，学生一起来，丫们就要派工作组进去打压。当然，丫们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维稳。哈哈，换了老龟命，继续走资路。走资大军真的是人才济济，永续不绝啊。）

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毛泽东传》）

（刘邓表示还不够，要向各地大中学派工作组。有“中央”打包票，还有神马好怕的，放开手干吧。）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传》）

（学生们起来早饭，老毛表示很好：战斗吧，小将们！“神都”就是北京，“南国踏芳枝”指毛去武汉南巡。“青松”指无，“败叶”指资。“满街红绿走旌旗”指红卫兵们在北京城大街小巷贴的大字报，“潇潇雨”指运动来了的混乱情景，“故国人民”指全国各阶级的都在思考这次运动中如何站位。）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毛泽东传》）

（老毛一开始就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怀疑。发言就是喊话：群众很活跃，

右派在顽抗，大家赶紧选队。)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传》）

（在运动中建立左派领导核心，这是整个文革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段话表明，老毛对于要害问题的认识极为清晰。以后的斗争，各地都冒出积极分子，但并没有及时建立领导核心，更没有在各造反组织之间形成有力的联系，中央文革和各造反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样在整体组织上就很松散。因此，表面看上去似乎早饭的人不少，但各地各自为战，甚至同一个城市的造反组织之间都没有完成整合，形成统一的组织，因此从整体力量上来说是很不足的。)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毛泽东传》）

（老当益壮，无产战士就是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组织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批。（《河蟹党屎》）

（哈哈，“钦定”的革命，“批准”的革命，“合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你相信吗？工作组的目的昭然若揭——稳腩！同样也是全国铺开，党羽遍地。资工作组在运动初期，双方各打四十大板的方法，俺们只能认为是资对这次运动性质认识模糊的表现。资采取了上次 57 年反右时候的做法，红色政权后代对沽名钓誉的“独立”知识分子实施专政，清洗本阶级队伍。)

6月18日，北大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

（这招儿其实没啥新鲜的，不过是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翻版，不同的是上次是纳粹，这次是资路线骨干。啥？证据？人民日报社论发了可以公开搞批斗，为啥这一小撮要私下搞？“一些学生”是谁们呢？难道不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陈小鲁们？丫们难道不是和工作组一个鼻孔出气？丫们斗所谓知识分子，高级教授和普通教师一起斗，再往工农子弟身上踩几脚，这就是所谓的“混乱”。受打压的早饭师生们出来抗争，贴大字报。然后工作组进驻，尿盆子扣到早饭的学生和普通教师头上，加以镇压。然后在河蟹党屎的叙述里就成了：早饭学生制造混乱，工作组出力维持秩序。）

根据刘的意见，党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刘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照办。”（《河蟹党屎》）

（哈哈，中央是谁们的中央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么？中央动作够快！资路线崽子们在当权派庇护下称王称霸，516通知发布之后无路线力量壮大，保皇派成过街老鼠，黄四郎的徒子孙们不能继续明目张胆的称王称霸，接下来会甘心交权吗？他们又会从黄四郎身上学啥招数呢？）

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河蟹党屎》）

（哈哈，资无当然都是得到多数群众支持滴！阶级社会，先阶级再左右，群众这个菜筐里面可是啥菜都有。如果造反派是少数，为啥人民日报发文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资崽子唱的这出戏，就是黄四郎打手摸黑冒充张麻子手下，四处奸淫掳掠，转移矛盾，瞒天过海的俗套招数嘛！）

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邓等领导人同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陈江康等的挑动和支持下，学生轰赶工

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到6月中下旬达到高潮（《河蟹党屎》）

（不是说工作组得到多数群众支持嘛，肿么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赶跑啦？工作组替谁撑腰不是昭然若揭吗？靠跪舔围观，转发关注，可以撵走工作组吗？力量，还是力量！）

7月19日、22日，刘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革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等多数同志的反对。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陈等的意见被否决（《河蟹党屎》）

（只想着合法跪舔的托派先生们看看，从来都是先有斗争，后有法律追认。托猪喜欢举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罢工成功的例子来证明上街有用。俺想，当时一定是资本家良心发现，血液里道德成分噌噌上涨，才同意的工人涨薪等要求。）

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周仲尼传》）

（还是仲尼成熟老练。不过这也可以说是分工。刘邓直接出击，仲尼居中调节。这样，仲尼就处在可左可右，可上可下，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矮子表示大哥如泰山，大哥不倒，我们就有保障。事实证明，走资兄弟们的配合相当给力。“报中央”，肯定是落在刘邓们手里，因此事实上还是走资要的结果。但仲尼说报中央，就在程序上把自己撇干净了。）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毛对运动的进展表示很不满，认为北京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7月25日，毛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京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河蟹党屎》）

（老毛敲打工作组，是给刘邓改错的机会。对待刘邓这样的坚定走资分子，这无疑太过仁慈了。）



毛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毛泽东传》）

（哪一派拥护工作组，哪一派反对工作组呢？谁在封杀群众对工作组的意见呢？看看当下，谁在堵截上访群众呢？工作组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跟信访办很像呢？）

毛认为规定“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7月28日，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也适用于中等学校”（《河蟹党屎》）

（这不准，那不行，总之得乖乖念口号，奉旨搞革命。早饭群众奋起力争，老毛从上施加压力，如此才取得这些成果，打破了走资分子设下的条条框框。群众们不自己起来斗，老毛发再多指示，能有何用呢？）

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河蟹党屎》）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河蟹党屎》）

（彭真在位的时候，北京是一个铁桶；彭被撵走李龟命继任，北京是铁桶一个。文革前，资崽子和学校当权派穿一条裤子；捅翻了当权派来了工作组，资崽子再和工作组一个鼻孔出气。不斗行吗？）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毛泽东传》）

（老毛认识清晰，及时总结，把准问题所在：派工作组，不是神马方式方法

问题，而就是走资立场的体现，是妥妥的屁股问题。基调既定，那么，对如何进行文革作出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了。可见，老毛一开始也没有神马非常具体的计划，而只有些大的原则性的想法。本来也是，只有左逼才一天到晚去搞神马制度设计；在设计出来个完美的制度，在设计出来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之前，左逼们是不会行动的。老毛清楚的很，神马制度，神马计划，都得根据具体的斗争形势来定。神马创新，神马方式，都鲜活地表现在群众运动当中。明智的人紧跟斗争形势，深入运动当中，细心观察，认真总结，及时提炼，如此才能得到切实的想法。再把这些想法加以扩散，化入群众运动之中，指导群众进行斗争，推进革命形势。这就是老毛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闭门造车，只能造出空中楼阁。）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战场是学校。各地早饭师生早对学校走资领导诸多不满，于是纷纷起来反抗，贴大字报。高干崽子们则及时进行搅屎，一手斗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一手压早饭师生。如此搞出一片混乱的状态。走资干部迅速作出反应，派出工作组，掌握运动领导权。刘邓们认为这是“先进经验”，值得推广，于是“中央”开会，作出决议，全国各地都往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早饭师生被压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老毛十分不满，发动反击，结合群众的抗争，打破走资派们设下的条条框框，撤掉了工作组。老毛进一步认识到，派工作组，不是神马方式方法问题，而就是走资立场的体现，是妥妥的屁股问题。因此，对如何进行文革作出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了。



## 第三章 批资反路线

前文说到，撤销工作组之后，老毛认为需要对文革如何进行做一个更具体的指导性纲领。于是老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最终通过十六条，确立基本方针、斗争方式、斗争对象等，形成比较完整的纲领。决议遭到众走资干部的抵抗，冲出校园，起来造党政干部反的红卫兵们受到走资干部的压制。老毛表示不满，合作伙伴林陈积极表现，共同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进运动发展。刘邓靠边站，仲尼搅屎忙。走资先锋还在走，老毛坚持搞政工。苦口婆心没效果，只得再加攻击力。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毛泽东传》）

（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来是要巩固前期战果，二是提出后续战斗方针。）

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毛泽东传》）

（唇枪对舌剑，针尖对麦芒。修养以组织瘫痪为理由，老毛直接否定。陈伯达进一步指出，派工作组就是镇压早饭学生的，打击学生积极性的。是啊，打打各路公知也就算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哪成？当今的小资不也是如此么？小资嚷嚷着要反大资，反垄断，当我们说要反一切资时，小资立马给我们扣上极左、流氓无产者、工人沙文主义、搅屎棍等等帽子。嘿嘿，小资们的算盘精得很：革了大资的命，小资来当大资，这很好；革了一切资的命，小资上哪发财呢？这不好。小资不满足于喝汤，而要吃肉。丫们自己又没胆量也没力量，于是怂恿苦逼工屁当炮灰，给丫们火中取栗。都二十一世纪了，丫们也该醒醒了吧。）

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毛泽东传》）

（所谓正式决定，首先是斗争的成果，其次要由斗争来维护。指望发个文件，定个宪法就万事大吉了，那是纯粹的幻想。文件也好，宪法也罢，既是斗争的结果，也是斗争的工具，没有以自身力量为基础的斗争活动，这些玩意儿就是一纸空文。）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毛泽东传》）

（老毛只是鼓励、助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现实矛盾，老毛喊破天也不会有神马普遍的红卫兵组织。当然，我们一点都不否认老毛的重大作用。他作为无先锋的代表，处在那样一个重要位置上，其一言一行当然都牵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整个阶级本身的组织和斗争。）

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

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毛泽东传》）

（哈哈，那些走资党干不恰恰是随时随地以党的化身自居的么？无产阶级反对他们，那就是反对党；由他们来领导，那才叫党的领导。再问一次：中央，是谁们的中央？嘿嘿，河蟹党现在不是搬出来个禁止妄议中央的党纪么？资专政这么些年了，此时搬这么个条例出来，是指望整肃党纪，焕发第二春么？）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传》）

（老毛直指修养要害：你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传》）

（竹叶青胸有成竹的其实是：我们有几百万军队，还怕那些早饭派翻了天不成！老毛直言军中就有牛鬼蛇神。竹叶青就是个大鬼嘛。老毛尸骨未寒，丫就密谋把他的亲密战友江青同志给投到牢里去了。）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八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

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毛泽东传》）

（河蟹师爷分析有理：老毛的大字报是长期存在的分歧的结果。不过，河蟹师爷说的又不对：不是神马意见分歧，而是立场上的根本对立。）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组织。林妹妹一路借老毛的力上位，之前联手在庐山会议上拿下彭大刀，此次又拿下刘修养，顺利挤到老二的位置。此时林妹妹和陈伯达还是无的合作伙伴。此次结果，资无力量七比四，资依然占上风。而且资依然牢牢掌控经济部门和组织部门。）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斗争对象：走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

《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方针：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

《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方式：用文斗，不用武斗。）

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范围。）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毛泽东传》）

（纲领制定完毕，那就开干吧。）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

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毛泽东传》）

（矛盾就在那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毛积极助推，鼓励群众起来造反。学生朝气蓬勃，富有造反精神。学生也不单纯是学生嘛，他们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或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不出来运动，不通过运动来锻炼成长，那是成为不了合格的接班人滴。失败了也没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来就是。）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革”的集会上，毛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河蟹党屎》）

（此时的北京有些像二月革命之后的彼得格勒，形式急剧变化，各方势力抱着各种目的纷纷涌入，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随着斗争形势渐趋明朗，矛头直指资路线，各方势力才站队开干！）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毛泽东传》）

（学生也不能老在学校里造反，既然是接班人，那就要冲出校园，到社会上动一动嘛。）

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毛泽东传》）





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河蟹党屎》）

（参与打砸破烂文物的肯定少不了早饭学生，有的左逼连这一点都不承认，俺们觉得很可笑。不过，神马把人搞成“黑五类”而殴打致死，这种事只有高干崽子干得出来。丫们在校园里就已经干过了，工作组也没少干这样的事。河蟹党史也是遮遮掩掩，就是不说那些鼓吹血统论的是谁。俺们丝毫不否认，革命就是各路势力的搅屎盛宴，就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如果说哪方更疯狂，不如说哪方觉醒的更早，阶级意识更明确。高干崽子早早继承老爹们的阶级立场，耳濡目染老爹们的斗争意识。再加上老爹们的幕后指挥，丫们当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搅屎机会。在土共党内，看不上神马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的干部多的是：我们出生入死，丫们寸功未有，凭什么活得这么潇洒，还一天到晚唧唧歪歪，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在之前的党外反右运动中，这些干部就出过大力了。对于这种资内部的斗争，我们当然乐得旁观。但我们从来不希望丫们的内斗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利好。俺们永远只能靠自己，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的力量。资社会老板们也内斗，甲老板灭了乙老板，丙老板吞了丁老板，这样的事时刻都在发生。难道我们能指望老板的内斗削弱资产阶级的专政力量？恰恰相反，竞争胜出者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成为更可怕的敌人。工屁只能争分夺秒地拉帮结伙，在斗争中壮大自己。）

“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

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毛泽东传》）

（在资看来秩序大乱令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无先锋队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担心斗争被利用被投机吗？根本不需要！被投机说明你有力量嘛。没力量，谁投机你？又有左逼说，大家都说马列毛的语言，都分不清到底谁是真的，谁是装的了。我们觉得这个担心也很可笑，大家都说，首先表明无产力量的壮大，不然谁会用你的语言啊？其次，你看一个人的立场，不仅要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嘛。左逼总是把别人都看得跟自己一样傻，哈哈。走资们觉得学生上街啦，大串联啦，学不上啦，不得了啦，糟的很呐。老毛很淡定：好的很，接着搞。）

最使周恩来感到焦虑不安的，是“破四旧”中发生的对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的侮辱、打骂、抄家等行为。对党内的同志，周恩来多以“一定要经受住考验”这样的话来鼓励他们，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严于律己，多作检讨。而对于受到冲击的党外人士，就不能那样来要求了。他想方设法来劝阻和约束青少年们种种无知的、粗暴的言行。（《周仲尼传》）

（还是仲尼最有大局观：红二崽子们啊，你们不要瞎搞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人，是咱们的力量啊；苦逼崽子们斗，因为民主人士、高知分子就是他们的敌人，你们可不能敌我不分，搞错斗争方向。）

八月底九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包括十条内容。《意见》强调：“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组织起来，学习和掌握政策”，“不能各自为我，违反纪律”。针对已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大串连，周恩来写道：“我们提醒你们，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党和国

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要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我们还要提醒你们，同厂矿、科研机关和服务性行业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意见》还就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作出一些具体规定。

九月三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会上，陶铸、陈毅、王任重等明确表示赞同。康生却表示反对，说：“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有代替的危险。”姚文元也话中有话地提出：“应该用阶级分析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还是夭折了。（《周仲尼传》）

（周仲尼搅屎，无先锋果断反击，阻止仲尼往学生运动头上套条条框框，束缚手脚。但是，仲尼的文件虽然没有通过，搅屎活动依然进行。）

“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办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周仲尼传》）

（约束、限制，这就是仲尼搅的屎）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周仲尼传》）

（既然是无专政，那就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嘛，工人学生大串联就没什么不可的。既然是无专政，那各行各业就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嘛，革命的秩序就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秩序，建设的秩序，就应该是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

进行建设的秩序嘛。既然工人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自己的专政受到了破坏，那理所当然要起来反抗，这才是专政者应有的态度嘛。一切秩序都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准嘛，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秩序，拿秩序为幌子来搅无专政的局，就应该受到工人的反击嘛。)

“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周仲尼传》）

（本来斗争的主要对象就不应该是那些“死老虎”，而是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新产生的剥削者，是现实地处于剥削地位并坚持维护剥削关系的阶级，是要通过斗争这些力量来消灭一切剥削关系，消灭滋生新的剥削阶级的土壤。至于斗死老虎，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斗死老虎的，当然既有高干子弟组成的黑卫兵，也有工人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干子弟斗，那是属于内部斗争。工人子弟斗，那是属于算旧账新仇。包括破坏文物之类的，两拨人都干过。有些左逼站出来洗地，把斗死老虎、破坏文物、迫害知识分子之类的“脏水”一股脑儿泼在高干红卫兵头上，替工人红卫兵洗地，纯属滑稽之举。这些举动，既没必要否认，也没必要反对。斗就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工人造反派一起来，斗争目标就锁定在直接压迫他们的那些人头上，这些人可不是什么旧剥削者，而是新产生的剥削者，他们才是走资派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根基。)

由于周恩来的地位、声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讲话风格和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使许多青少年深受教育。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后来同东城区、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组成“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学生组织，就是在这种影响和事实的教训下，开始怀疑或抵制一些无政府主义言行，逐渐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周仲尼传》）

（西纠、联动是些什么货色，稍微了解一些文革史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河蟹师爷都明示他们是受了仲尼的影响而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并且师爷言语中流露出对他们的赞赏。这是在夸仲尼工作做得好，培养了西纠、联动这样的反中央文革的急先锋。仲尼劝导高干子弟们不要把矛头对准死老虎了，他们

已经不是什么敌人了，连内部矛盾都算不上了。仲尼让高干子弟们看清楚，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中央文革这帮人，以及这帮人的支持者。仲尼强调，认清敌人，这是反革命工作的首要问题。）

对于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来也常要亲自处理。九月十九日，他对中央给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被批判、斗争对象工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稿作了修改，并将报告中“凡属定性的暂时只发给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养的家属生活费”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将报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资可暂发给”一句，改为：“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周仲尼传》）

（这就是所谓的迫害！被定性的还有工资可领，本人及家属生活无忧。但仲尼就是把这当成迫害：不行，工资也不能强行减少！人家愿意少领那是人家觉悟高，你们克扣削减就是居心叵测，就是迫害。未定性的工资绝对不能变，依然好吃好喝待着。这就是所谓的迫害！老龟命们还得感谢迫害者，感谢他们帮老龟命们去了三高，得以在复辟后再过几十年好日子。这可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观丫们对早饭派的迫害镇压，那只能说无所不用其极，不斩草除根不罢休。去他妈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屁股决定脑袋，丫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丫们不可能悔改，给丫们一万年他们也不会和无产阶级尿到一个壶里。一切不从根本的阶级地位，不从生产关系着眼的反修防修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

他反对造反派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九月初，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进行保护。这以后，他始终坚持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周仲尼传》）

（仲尼一声怒吼：什么群众，分明是暴民！暴民还想翻天，大胆！我们连经济待遇都不让，更何况关键岗位！坚决维护领导干部，坚决打击早饭暴行！）

周恩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河蟹党屎》）

（只要经济基础不乱，想唱红歌就唱吧！想骂娘就骂吧！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才能消灭，仲尼很清楚斗争的关键所在，早饭群众当然也知道要害在哪里。）

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

（群众运动更加深入，走资干部反抗加剧。）

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毛泽东传》）

（走资干部反抗加剧，表明丫们立场坚定，力量强大。刘邓已不在，反对力量还那么大，只能表明一件事：朝里还有人，党内还有派，党外还有群。因此，有必要再加大进攻力度。）

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毛泽东传》）

（代表两个阶级，自然是两条路线。压制早饭群众，镇压无产革命，那只

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各领域、各地方、各单位，都普遍存在着阶级矛盾，那当然要把斗争往更深更广处推进。)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传》）

（文革小组火眼金睛，立即认出仲尼这个大搅屎。刘邓已走，仲尼还在。刘邓不算啥，仲尼一顶俩。老毛并没有做出回应。这也是俺们很困惑的地方：仲尼自建国以来就一路搅社会主义的屎，对无的政策阳奉阴违，何以老毛不对仲尼展开斗争？原定修养为接班人，既然修养都动得，何以仲尼就动不得？而且显然不只是文革小组对仲尼不满，之前的早饭学生就有不少反对仲尼的搅屎姿态了。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早饭群众中，一直有一股反仲尼的力量，贯穿文革始终，但始终没有对仲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传》）

（林妹妹积极表现，明确站队。若不如此，丫啥时才能跳出刘邓周叶党委、工作组的五指山呢？必须向老毛靠拢，才能搬动这座大山。)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传》）

（林妹妹的师爷也积极表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毛泽东传》）

（林陈推早饭运动之波、助早饭运动之澜，此时还是无的伙伴，老毛也表示欣慰。）

工作会议之后，林、陈的讲话被大量印发，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河蟹党屎》）

（这不是很正常吗？骑墙派，没有牢固基础，在斗争中必然快速分化。有经济基础的投机者，会被自己阵营推向风头浪尖，等到弄清楚文革原来就是要操自己时，就该分道扬镳了）

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河蟹党屎》）

（群众傻吗？不傻！知道运动会过去，机会来了，能搭顺风车就搭，能提要求提。现代人不要认为，那时人傻，是被误导利用。自称傻的人，往往不傻；认为别人傻的人，是在给自己的无知找借口。）

10月18日，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11月中旬，聂元梓率人前往上海“点火”，动乱进一步升级，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受到批斗。正在住院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受到冲击（《河蟹党屎》）

（上海作为争夺的主战场并不偶然。资不强大的地方，无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斗争往往开始的晚。但基础好，后续的斗争往往更能持久。纵观整个文革，只有上海是无的力量压倒资，并建立了无自己的政权的城市。）

在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各地还出现了“抓叛徒”活动。在北京发生了揪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这是康生为打



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诬陷刘少奇而捏造的一桩冤案（《河蟹党屎》）

（路线斗争是本质，至于以什么形式达到，抓叛徒可不可以，贪污腐败可不可以，老婆崽子买法国别墅可不可以？这批文革期间第一批倒下的资代表，改开后全部起复委用。这帮人中诞生了诸多清醒的 DXP 分子。从这个角度讲，文革无发动的第一拨“斩首行动”，可谓定位精准！再说，文革时候整所谓黑材料，并不是表明某某以前如何，而是为了表明某某一贯如此，死不悔改。看过《仲尼搅屎录》系列的朋友，难道不是很容易就能判断拨清波的资立场么？老康精确打击，快而准。）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毛泽东传》）

（老毛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针。）

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毛泽东传》）

（老毛苦口婆心做政工，各级干部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走资路线。老毛失去耐心，那是迟早的事了。）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毛泽东传》）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哪里有矛盾，哪里就

有斗争。工农业不是没有矛盾，相反，矛盾太多了。仲尼们一路搅屎过来，走资基础雄厚，怎么会没有压迫，没有矛盾呢？更为激烈，更为广泛的斗争即将来临。）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保持主动进攻，先是老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最终通过十六条，确立基本方针、斗争方式、斗争对象等，形成比较完整的纲领。准备开干。但决议遭到众走资干部的抵抗，冲出校园、起来造党政干部反的红卫兵们受到走资干部的压制。对此，老毛表示不满，而合作伙伴林陈则主动靠拢，积极表现，共同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进运动发展。此后刘邓靠边站，仲尼依然搅屎忙。走资先锋还在走，老毛坚持搞政工。但是苦口婆心没效果，那么只得再加攻击力。老毛还是太仁慈了，哪怕对待资路线的带头人，仍然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留有让对方回头的余地。可是想想，成为亿万富翁的老板，他们是在多少苦逼的白骨上面剥削的财富？成为老板代言人的官员，他们又递交了多少笔投名状？倒戈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意味着背叛原先所有的社会关系阵前倒戈，谈何容易？仁慈，在阶级斗争中，就是愚蠢！



## 第四章 工总司早饭

前文说到，学生们冲出校园，参加对党政走资的批判，并且下工厂到农村和工农搞串联。由于矛盾的普遍存在，因此，随着学生运动的展开，工人也积极加入到斗争当中，并且成为主力。上海率先成立了工人早饭组织“工总司”。资无双方围绕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角力，进一步是关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合法性，工人组建造反组织的合法性的斗争，而其实质，则是资无双方喊话，号召自己人站队，投入斗争。张春桥当机立断，承认工总司合法性，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吹响无产阶级战斗的冲锋号。周仲尼率众反击，陈伯达叫苦不迭。随后，林妹妹联合文革派展开攻击，老毛提供后援。工人早饭终于得到承认，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随着全国上下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原来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党政机关、文教系统的规定，在实际上被打破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不仅在机关、学校里，就是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也纷纷建立群众组织，互相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更大了，工农业生产各部门尤其是工业交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干扰和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抓革命、促生产”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不能不使周恩来忧心如焚。（《周仲尼传》）

（小资们就是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文艺大革命，在文化教育系统让学生发泄发泄，最多再搞几部文艺作品，搞一下斗私批修，就算完事了。可是，既然叫无产阶级的革命，怎么能没有工人群众的参与呢？工人群众不但要参与，而且要成为绝对的主力嘛。工人群众参与，就不只是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是要进行实实在在的斗争，以物质力量去斗争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压迫力

量，这才是阶级斗争嘛。什么各方面的工作陷入瘫痪或半瘫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搞恐吓威胁嘛。且不论实际上是党政领导们自个儿撂挑子不干，搞起了“罢工”，想趁此看工人的笑话。即便真是工人群众们把他们轰下台，那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工厂生产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各项管理工作也是顺势由工人们接手，正是在这时，工人们发现，什么管理，什么调度，根本没有什么神秘性嘛。工人们完全可以自己组织生产，组织革命嘛。正是在这时，工人们才鲜明地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滋味，深刻地体会到生产关系革命所带来的快感。踢开走资派，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周恩来说：“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抄他们的家。”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红卫兵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纠纷，周恩来还说过，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周仲尼传》）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全国混乱加剧，许多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局面。周恩来极为焦虑。他认为工厂和学校不同，生产决不能中断。他一再向国务院有关人员讲：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周仲尼传》）

（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之余闹革命。仲尼从头到尾拿生产与革命的对立来搅屎。可是，在工人们看来，革命就是对生产关系的革命，革命就是对试图建立或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领导”的斗争，这种斗争，既要在生产中按各自部门、各自单位、各自工厂分别进行，又要在生产外跨部门、跨单位、跨工厂联合进行。所以本无所谓生产与革命的对立，更不能以生产来压制革命。)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

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仲尼传》）

（仲尼继续用生产压革命。老毛说革命生产双胜利，仲尼这儿就变成一切以生产为本。俺们要问的是：谁的生产？）

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代表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陶铸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的规定，没有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河蟹党屎》）

（国民党也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政党，不过是赤匪嘛！力量到了，自然就追认了）

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带2000余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一事件被称作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承认以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河蟹党屎》）

（托猪秋火之流推崇的2012港逼码头工人上街罢工走秀模式和台逼退休工人联合会模式，与工总司，与六十年代港英工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相比，简直弱爆了！香港工人的先辈们，那时怀着仇视、鄙视、蔑视的心情，对港英老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春桥同志勇敢果断，一屁股坐在早饭工人一边。）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毛泽东传》）

（老毛久经沙场，因此，很清楚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谓概念无非是对既定事实的追认罢了。）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毛泽东传》）

（哈哈，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连工人能否革命、能否串连都成了疑问！走资们难道不正是表面上吹神马工人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却是打压工人阶级革命积极性，专了工人阶级的政么？你要是个普通工人，你要怎么办？发微博求关注么？跪舔良心人士么？轻飘飘地喊几句口号么？）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毛泽东传》）

毛主席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王力反思录》）

（谈不上老毛改变主意，而是工人运动起来了，老毛立即选择站队而已。革命运动，学生早饭只能是序曲，工人才是主力。学运不与工运相结合，那只能是儿戏。老毛清楚地指出，五四运动、文化革命，学运都只是序曲。即便是离我们最近的八平方事件，发挥主要影响的也是工人运动，而不是天安门前几个学生娃娃。河蟹之所以不提工人，而只提学生，因为河蟹很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今后的斗争也是一样，学生运动若不融合进工人运动，不和工人运动相

结合，那依然不会伤到河蟹的皮毛，那纯属是给河蟹挠痒痒罢了。）

陶铸、谷牧、余秋里和对工交企业几个月来遭受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的与会者，纷纷以事实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稿，赞同周恩来等人的一贯主张，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河蟹党屎》）

（哈哈，要走资党委统一领导，又不准搞群众组织，最多只能业余搞一搞。工人只能老老实实干活，不要那么多歪心思；不要搞红色工会，工人的事自然有党委领导的黄色工会来管，哈哈，这跟河蟹老板们的想法有半点区别么？说他们走资，难道有半点问题么？）

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毛泽东传》）

（哈哈，秀才遇到老龟命，也是无奈得很啊。单枪匹马去挑战群熊，显然不行嘛。）

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毛泽东传》）

（文革派联手林妹妹，展开群狼战术。张春桥一马当先，发起攻击。陈伯达有了后援，也顿时斗志高昂起来。仲尼挺身而出，保护小弟。林妹妹针锋相对。）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河蟹党屎》）

（斗争结果：工人早饭合法化。但是，这下大家就满足了吗？难道不是应该趁势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展开更浩大的运动么？）

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毛泽东传》）

（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支持的。敌人痛骂的，正是我们赞扬的。敌人伤心，我们开心。敌人哭，我们笑。敌人不能好好工作，我们才能好好工作。老毛很清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阶级矛盾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神马仲尼修养，神马矮子陈云，俺们根本不从个人品质去评论，而只分析其阶级立场。进一步的，就要分析这些走资派的群众基础。于是就要对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进行剖析。阶级关系，无非源于生产关系嘛。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



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传》）

（用老办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显然行不通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只能用现实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去推翻。）

有人对所见、所闻的混乱局面感到困惑。有人撰文对“血统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出现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一些工矿企业的老党员、老工人、老劳模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搞乱工厂生产秩序的造反行为（《河蟹党屎》）

（开始时大家都不清楚，操起来才清楚自己的屁股——经济利益所在，阵营开始分化。谁提的血统论呢？不正是二代崽子们么？保皇派们么？谁对血统论提出尖锐批评呢？不正是早饭学生和工人么？那么，又是谁质疑中央文革、质疑江青同志呢？嘿嘿，老党员、老劳模出场了。他们屁股坐在哪一边呢？这些人，不正是走资派在工人当中的群众基础么？以为劳模是无害物种的工友们该醒醒了。）

11月13日和29日，军委的几位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江青认为叶、陈“镇压群众”，并作为“十一月黑风”加以批判（《河蟹党屎》）

（学生→社会→厂矿→军队，各路都开操，旧有专政机构全面接受无的检验。竹叶青早就放出话来，说几百万军队握在资手里，镇压早饭群众不在话下。这会儿子他们自然不会旁观，而是迅速出击，掀起十一月黑风。江青出来反击。要到林妹妹跟上，形成合力，反击才能生效。）

（下面，看看仲尼这段时间在干嘛。）

十一月十四日，批示制止安徽造反派批斗省委领导人李葆华、李任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先后起草答复西北局和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的电报。劝阻两地红卫兵公布和追查刘澜涛、赵林等人的出狱问题。

十二月十九日，阅改康生送来的中央关于撤销林枫中央党校校长的通知稿，不同意给林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万急”件批告汪东兴、童小鹏：不能让清华红卫兵冲入中南海揪王光美，因为揪斗王光美势必联系到刘少奇，无论如何要劝阻。两天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一事请示市委对此应采取什么态度，周恩来批：可不去。

十二月下旬，接到关于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成都“押解”彭德怀来京的报告，急告西南局要彭德怀乘火车来京，并派护卫武装，防止途中事故。

十二月三十日，得知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立刻电告广州军区对薄“如彭德怀一样”乘火车护送来京。

十二月三十一日，针对军事院校学生批判陈毅、叶剑英一事，起草讲话提纲，指出：将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十二月底，批示同意屡遭造反派批斗的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留京住院治疗。

（《周仲尼传》）

（哈哈，走资大哥周仲尼可真是救火队长啊。）

六六年最后两个月的斗争，主要是工人开始进入战场。上海率先成立了工人早饭组织“工总司”，拉开了工人组建自己的早饭组织进行革命运动的序幕。随即，资无就双方围绕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角力，而其实质则是各方喊话，号召本阶级的群众认清形势，选择站队，投入斗争。张春桥当机立断，承认工总司合法性，吹响无产阶级的战斗号角。周仲尼率众反击，陈伯达叫苦不

迭。随后，林妹妹联合文革派展开攻击，老毛则提供有力的后援。最终，工总司得到承认，工人早饭也得到正式认定，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轰轰烈烈的工人早饭运动已近在眼前。学生运动当然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但工人阶级无疑成为了运动的主力。

这也表明，总是先有革命行动，再有对革命行动的事实承认。试图通过理论辩论的方式向敌人证明自己活动的合法性，非如此就不活动的人，实际上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只有通过斗争展示力量，斗争才会得到承认。话说回来，敌人承不承认都不妨碍我们展开斗争。敌人的承认不过是我们的工具而已，好用则用，不好用则不用，一切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准，根据具体的斗争形势来定。



## 第五章 一月夺权与二月逆流

工总司被承认之后，就顺势展开了运动，对前期搞镇压的市委和上海各媒体机关展开反击。老龟命们见势不妙，纷纷罢工撂挑子。早饭派也是不客气，张屠夫走了，我们自己剃猪毛便是。这就是所谓的一月夺权。军中走资一直脾气大，明里暗里各种搅屎。有一次听说老毛批中央文革，丫们以为反击的时候到了，于是在仲尼主持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小组的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二月逆流的高潮。老龟命陈毅和谭震林菊花四放，成为资中猪队友；文革小组实施反击，林妹妹加入，攻击力增强，老毛施以援手，结果拿下几个军中老龟。

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毛泽东传》）

（上海革命基础还是要比其他省市好很多，一是产业工人多，阶级力量强；二是老柯一直坚持无的路线，因此留的底子要好一些。）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毛泽东传》）

（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部，他听托猪的合法建议了吗？各路合法托派，工运服务商们还在争这权那权，唯独不考虑壮大自己的力量，破坏生产，阻断流通。托猪们倒是和老板一样，认为这是流氓行径，哈哈。）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毛泽东传》）

（先把舆论工具拿到手里，为早饭活动宣传造势。政府位置空了，当然得上。阶级斗争不夺权，那还斗个毛。张春桥们好样的。不过，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纵观整个文革，无只有在上海掌握了政权，其他各省市，始终都是资力量掌权，即便到了三结合革委会，依然是资力量占上风，死死压制无的力量。第二，即便是上海的所谓夺权，也不过是接管罢了。各路资比主动罢工不干，试图以此相要挟，无当然不吃这一套：你们不管，我们来管，有神马大不了。其余各地的所谓夺权，也都是如此。党政资逼们见形势不好，都穿上军装躲到军队里寻求庇护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党政机关瘫痪，所谓的大混乱。资逼们觉得糟的很。我们觉得好得很。本来就是要夺的，丫们自个儿放了，我们当然要去接嘛。说是夺，那也无所谓嘛。反倒是对早饭派革命精神的赞扬嘛。我们倒是乐意看到这样的现象。）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

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毛泽东传》）

（管理工作很神秘？官僚都是神秘物种？丫们平日躲在各种高楼大厦、机关大院里，搞得神神秘秘，深不可测；说话假模假式、故作高深，还真能唬住些个平头百姓。早饭派们接手一干，发现不过如此嘛。老毛表示确实如此。资逼们以为撂了挑子，早饭派们就得束手无措，闹笑话了。结果事与愿违，死了张屠夫，咱还是不吃混毛猪。一开始不懂，那也没什么嘛，谁还不是从不懂到懂。就是要在管理中学习管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论抗日也好，反蒋也好，要是抱着非老兵不上战场、非老将不能取胜的执念的话，那土共还是趁早洗洗睡了吧。）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泽东传》）

（既然掌握了舆论工具，那就开足马力搞宣传。物质批判要搞，舆论攻势也要造。）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毛泽东传》）

（力量到了，追认的合法就来了。半年前还是临时性质的文革小组，现在已经齐名于传统常设最高权力机构，并且成了能动性最高的机构，引领斗争方向的机构！投机进入的其他势力代表，都要重新站队了。墙头草是挨操的。“先进经验”当然要及时推广嘛。）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毛泽东传》）

（我们认为，河蟹师爷的分析有道理，很中肯。）

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毛泽东传》）

（工人就是要在管理中学习管理，在革命中训练干部。）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

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回忆江青同志》）

（这个时候就可以判别各种立场了：陈伯达是个投机的，仲尼明显走资，春桥、江青同志立场坚定，老毛支援给力。）

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山西省，青岛市，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先后在半月内建立革委会，接管原先的省委和人民委员会，党、政、财、文等一切领导权悉归该委员会“接管”。逐步觉悟的群众，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



### “文化大革命”（《河蟹党屎》）

（从这里俺们看到的是逍遥派的屁股，绝不是无这一方。所谓不觉悟的群众，从来就不存在。群众依他们的经济屁股和社会关系，决定在文革中的站队。这些群众很觉悟，国家免费大串连，到哪里都是主席的客人吃喝免费，为啥不串呢？可以批斗骑在头上的领导，厂长，为啥不批呢？）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传》）

（从来就不是个别人物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问题。各自有各自的先锋队在党内代理。怎么斗？那不是拍脑子就能想出来的。总是底下群众动起来了，先锋队及时站队，及时跟进，不断总结经验。一路下来，也是矛盾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群众才普遍地动起来。在运动中，出现各种斗争形式，先锋队就是要在无的立场上加以选择推广。）

周不能否定夺权，但竭力把它的含义解释为夺取“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权，而并非全部党、政、财、文大权，一些党政机关业务部门的权力仍应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河蟹党屎》）

（周的立场始终与文革小组对立，代表资路线利益团体极进曲解之能事，你见过不要党政财文权的革命领导权吗？空中楼阁？）

“一月夺权”后，张春桥在上海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即所谓“全面夺权”。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随后的尖锐冲突中不断表现出来。（《河蟹党屎》）

（搅屎与反搅屎——你不说那四个权，我还不知道要全面夺权。）

打倒陶铸，显示了文革小组陈、康、江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权力。继陶铸之后，刘志坚，萧华等，也先后被林、江、陈等人打倒（《河蟹党屎》）

（并非是陈康江三人有什么特殊“权力”，而是康生经验足，深得群殴的要领：集团对抗，要逮住对方一个人，往死里打！最好是最霸道嚣张挑头的，像陶铸这样的硬骨头，打倒一个起到震慑作用！示范作用极佳！这种方法，同样适合少对多和多对多的群殴。）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毛泽东传》）

（哈哈，被走资篡了权的“社会秩序”，走资的各级组织，走资的群众基础。资分子觉得糟的很，俺们觉得好的很。）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毛泽东传》）

（老龟命被捅到了菊花，自然很不理解；这下又被动了奶酪，那就强烈不满鸟。）

1月19、20日，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军队开展“四大”。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保家卫国。

（弱小的无面对强大的资，是和平竞赛，还是主动进攻？道理同群殴）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

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毛泽东传》）

（毛这时的批评显然是个忠告：你们不要冲的太靠前，还得多和我商量着来。老龟命们看到漏洞，立即像苍蝇见了屎一样兴奋不已。丫们以为发动反击的时候到了。）

在2月16日的碰头会上，叶斥责康、陈和张：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河蟹党屎》）

（想干什么？明摆着就是要捅你们菊花嘛。）

“聂也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河蟹党屎》）

（聂帅锅，你介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嘛！你咋不说说北京八一中学（荣臻学校）里面的红二代资崽子们，在去年夏秋，干了啥黄四郎冒充张麻子的事情？师大附中的同伙都干了啥事？清华附中的？东纠，西纠，海纠，联动……资团队从中央到地方的接班人们都干了啥？仲尼为啥特地安排贴身秘书指导你们崽子的活动？说说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不是时髦反思嘛，忏悔嘛，道歉嘛！“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神马？”）

“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

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河蟹党屎》）

（当措词尖锐的时候，往往是处于下风的时候；当能用力量解决对方时，是不需要废话的）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毛泽东传》）

（陈老龟菊花绽放。）

2月16日晚，陈毅还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讲话，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卑劣行径（《河蟹党屎》）

（尼玛周派工作组收拾聂元梓，是因为北大学生在校内搞大字报不避着留学生（留学生可以不走三角地嘛），陈立马就对留学生发表长篇训话。介充分说明文革的必要，为啥“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毛泽东传》）

（陈老龟绽放的菊花害了大家，成为一枚猪队友。）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

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毛泽东传》）

（谭老龟也是糊涂蛋，反革命菊花送到自己敌人手里，又是猪队友一枚。林妹妹加入斗争，形势发生逆转，资军头遭到压制。）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回忆江青同志》）

（谭震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应该是属于被裹挟。毛江对谭还是手下留情了。）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

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投机陈的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丫和林妹妹一个尿性。林妹妹当年在井冈山陷入困难的时候就发出过红旗还能扛多久的疑惑，一天到晚垂头丧气，满脑子悲观念头。康生根本不担心得罪人招报复的事。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老康主抓，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康陈一比，高下立见。）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毛泽东传》）

（周仲尼继续搅屎。老毛还是太仁慈了！文革是路线斗争，双方都是利益集团代言人，玩制衡，和稀泥，难道大家就停火啦？）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师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毛泽东传》）

（事实证明，和稀泥没有用，改善处境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不过停止政治局活动，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也算是无的一个斗争成果。）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还是采取主动进攻。先是工总司对前期搞镇压的上海市委和各媒体机关展开反击。老龟命们见势不妙，纷纷罢工撂挑子。早饭派接管部分工作。这便是所谓的一月夺权。军中走资一直脾气大，明里暗里各种搅屎。有一次听说老毛批中央文革，丫们以为反击的时候到了，于是在仲尼主持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小组的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二月逆流的高潮。老龟命陈毅和谭震林菊花四放，成为资中猪队友；文革小组实施反击，林妹妹加入，攻击力增强，老毛施以援手，结果拿下几个军中老龟。老毛心慈，还是不断改善老军头们的处境，但是丫们并未因此改变立场。可见光靠仁慈是木有用滴。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 第六章 三支两军与王关受挫

前面说到工人早饭派起来之后，党政资分子撘了挑子。上海早饭派顺势接手管理工作。但其它省市早饭派并没有及时顶上。于是就发生了所谓的全国党政机关大瘫痪，大混乱的情况。老毛觉得军队还是可靠的，于是派军队支持左派，并对早饭派们进行训练，培养战斗能力。仲尼趁机搅屎，把支左变成三支，又加上军管变成两军，于是支左军训便成了三支两军。军内无论是林妹妹一派，还是林妹妹敌对一派，实际上大多为走资分子，因此实施军队支左，实际上就是支右压左。早饭派面临空前危机。关锋发文攻击军内走资派，王力讲话抨击仲尼外交路线。俩人触到仲尼们痛处，正好老毛退守，林妹妹集团闪人，于是仲尼们顺势拿下王关。老毛暂停进攻，文革派陷入低谷，但江张依然坚持战斗。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毛泽东传》）

（老毛这时还觉得军队是可靠的，于是考虑派军队支持左派，以便帮助左派尽快成长起来。）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毛泽东传》）

（竹叶青们表示：我们就是秩序，反对我们就是反对秩序。）



1月21日，毛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月19日，毛要求军队分期分批对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周发出“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决定（《河蟹党屎》）

（仲尼确实是资先锋队的神级搅屎棍！针锋相对！你支一个，我改成三个，分散你力量；你军训，我就加个军管，限制你行动！）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毛泽东传》）

（老毛依然信任老军头们。）

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毛泽东传》）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毛泽东传》）

（神搅屎周仲尼很清楚要害所在：重要生产部门、专政机构。因此仲尼立即派军队接受这些部门，实施军管。可以看到，两军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变成了军管。各路军头掌权、占坑，早饭群众没占到什么位子。因此，所谓的早饭派全面夺权根本上就是无稽之谈。）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

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师。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回忆江青同志》）

（哈哈，支左实际是支右。搞特权，只是走资的表现之一。作为斗争手段，当然可以指出谁谁搞特权。但阶级斗争不应该限于此，还应上纲上线，明确其所推行的政策，如何表现了资的立场。如此一来，斗争才能不停留于斗人，而是深入到斗路线。）

周恩来说：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毛泽东传》）

（哈哈，仲尼搅得一手好屎，三结合还是军队为主，军队来推，革命群众滚一边。仲尼干什么都不忘打老毛的旗号。这就是仲尼高明的地方。）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

（进一步把军管会变成最高领导机构。请问，还要革命群众干神马？这就是对老毛最高指示的执行？碰上这样的神搅屎，老毛要哭晕在厕所。）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传》）

（“有的同志”明显是无的人。仲尼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什么立场难道不是很清楚么？所谓的“群众”支持，是神马群众呢？是哪一派的群众呢？）

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毛泽东传》）

（核心部门依然牢牢掌握在资手里，无只在教育部和文化部占据上风。这么说，文革还真的就是文革咧。）

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毛泽东传》）

（哈哈，到底要支持哪一派，军头们心里门儿清。）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和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毛泽东传》）

（文件总首先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对群众组织开枪，表明之前干过对群众组织开枪的事。不准随意捕人，表明之前随意捕过人。不准大批捕人，表明之前大批捕过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表明之前就是这么干的。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

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表明之前是锱铢必较的。“军委十条”的出现本身，表明之前的三支两军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丫们干的完全是支右压无的勾当。)

1967年工人总部等12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55)以后，造反派分裂成了“香花”派和“毒草”派。支持的一派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香飘云天外”，被称为“香花派”；反对“二·八声明”的说它是大毒草，被称为“毒草派”。(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

(二八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对军队支左表示拥护，对武汉军队工作表示支持。香花派认为这个声明很好，是香花；毒草派认为这个声明很糟，是毒草。武汉地区工人阶级的分裂只是全国各地普遍情况的一个例示。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普遍分裂为保守派和早饭派。保守派自然成为走资派的群众基础，要么是周仲尼一系的群众，要么是林妹妹一系的群众，而早饭派则成为文革派的群众基础。但早饭组织也并非一开始就明辨时局，有不少跟错队的，在受到打压之后才醒悟过来，比如武汉不少香花派，遭受了军队镇压，才明白过来，加入反对走资军头的队伍。)

当武汉军区3月17日逮捕朱鸿霞等几百名工总头头，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并要九一三去请罪时，支左的153部队进入一治，虽未抓我和其他一治的主要头头，但同样视毒草派的造反派为非法组织。他们要我们解散组织。他们从造反派手中夺回了权力，并一手扶植保守派组织。(《悲欣交集话文革》)

(打击早饭头头，定性反革命；扶植保守派，奠定基础力量。)

4月28日，我和曾繁运与武汉地区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等造反派头头彭勋、刘传福、王彩珠等人一道，与陈再道在京西宾馆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实际上是头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批评了他，他在北京跟造反派代表见面完全是做个样子给中央文革看，他根本没有转变态度的意思。(《悲欣交集话文革》)

(反革命老将敷衍革命小将。)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悲欣交集话文革》）

（坚持斗争，积极联络。不斗争，光转发是没有用的。中央文革立场坚定，支持早饭派。）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正是因为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率先实施武力攻击，才有江青“文攻武卫”的喊话。保守派不武攻，何来早饭派的武卫？）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

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7.20 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那个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竟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 1969 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掌了权，当然不会称颂早饭派嘛。污蔑、辱骂、诅咒，我们都视为赞美。对待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搞神马埋怨、指责、诅咒之类的攻击，而是要给以现实的武器的批判。）

20 日凌晨，小曹来到我和张维荣，彭勋住的房间，紧张而又小声说：“出事了！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去，还打了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冲进了武汉军区。”我们立即起床，通知在新湖大立即召开全市造反派头头会议，商量对策。

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 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 8201 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放枪。百万雄师的车上也是全副武装，举着铁矛，戴着安全帽，疯狂地叫喊着“打到王力，打倒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叫喊着他们编造的谎言：“毛主席最新指示：百万雄师大、好、纯”等。1976 年 10 月事变以后，官方编造历史，说是王力、谢富治到红水院的讲话表态支持造反派，激怒了百万雄师和 8210 部队的

指战员。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7月19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军区个别领导人、党内走资派和公检法、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战士和基层群众，公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悲欣交集话文革》）

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

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传》)

(嘿嘿, 两种立场, 两种叙述。仲尼是大大地狡猾, 叫谢王不要公开露面; 不露面怎么接触早饭派组织, 怎么最大程度给予鼓励支持? 都像仲尼一样搞特务工作? 至于老毛的最高指示、苦口婆心之类的不过是徒劳的努力罢了。再多“最高指示”也化解不了阶级矛盾, 再多苦口婆心也改变不了走资立场。斗争越激烈, 分化越清楚。)

7月22日, 文革小组组织数万人欢迎谢、王回京。25日, 北京举行了欢迎谢、王归来, 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河蟹党屎》)

7月23日清晨, 我在新华工校园里听到高音喇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王力、谢富治同志胜利回到北京,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悲欣交集话文革》)

(文革小组力挺谢王, 革命群众倍受鼓舞。)

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 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 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 认真改正, 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 仍然可以站起来, 参加革命行列。”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 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 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 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 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 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 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 那是易如反掌的。”(《毛泽东传》)

(江林坚决斗争, 老毛心慈手软。)

七月二十二日, 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 “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 叫做‘文攻武卫’, 这个口号是对的!” “不能天真烂



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毛泽东传》）

（敌人已经举起屠刀，你要放下武器？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了。文攻武卫也是革命群众自己的创见嘛，江青只是明确站队，大力宣扬而已。）

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毛泽东传》）

（林妹妹固然意在铲除异己力量，但他说带枪的刘邓路线却丝毫没错，揪军内走资派也是有的放矢。这是一个好时机。）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传》）

（社论是关锋手笔，方向明确，思路清晰。）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

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回忆江青同志》）

（仲尼趁机搅屎，拿下关锋。其实对仲尼来说，陈伯达和关锋都是敌人，最好是一锅端了。但陈伯达比较狡猾，于是只拿了关锋下手。这时也可看出林妹妹集团和文革派不是一路人。前面联手攻击，等到敌人反击的时候，陈伯达找借口闪了，林妹妹也是按兵不动，继而溜之大吉了。）

武汉发生 720 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 720 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

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回忆江青同志》）

（林妹妹的居心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就是要趁机拿下军中大权。关锋再一吹，从理论上提出揪军内走资派。看上去林妹妹和文革派已是铁板一块，大有联合掌握军政大权的趋势。老毛对林妹妹集团还是有所警惕，于是想通过保陈再道等人来对林集团加以平衡，起一个缓冲作用。但由此就要伤及文革派，在林妹妹和陈军头们的拉锯中，软柿子就要被挤伤。林妹妹虽然底子厚，但见老毛要保军头，也明智地选择暂避锋芒；保存实力，伺机再战。毫不犹豫地把文革派推出去挡枪。文革派对林妹妹警惕不足。经此一役，就应该能看出林集团不是一路人，丫们关键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先前的合作伙伴。因此，根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林集团身上，而是要自己想办法发展军中的无方力量。文革派基本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在军中根基深浅。谢富治是无在军中的代表，但

力量而言还是微弱。尤其老谢 72 年就去世了，是无的一大损失。老毛可能正是看到军中无方力量的微小这一点，所以选择和老军头们妥协。但这种妥协显然只能是暂时的，关键还是要发展军中的无方力量，革新军队当中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行动呢？要如何发展无方力量，革新军队关系呢？我们将在后文提出我们的看法。）

王力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外交部的运动阻力很大，不要把外交神秘化，红卫兵也能搞外交，外交部的三结合班子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造反派当场成立“夺权指挥部”，外交部政治部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领导被关押。造反派以外交部监督小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河蟹党屎》）

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回忆江青同志》）

（早饭派要输出革命，周仲尼坚持和平共处。老毛谨守组织的条条框框。）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毛泽东传》）

（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句话，资力量不能动摇。）

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

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毛泽东传》）

（仲尼不是最讲究在外宾面前维持国家脸面的么？肿么就把极左们干的“丑事”抖搂给外宾了呢？）

六六年十二月主席生日那天晚上，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回忆江青同志》）

（仲尼搞外交一路三和一少下来，中央文革早就看不顺眼了。七二〇王力没出文，做了个八七讲话，算是对这条路线的侧面攻击。那会儿仲尼脸色就老难看了，被捅到了菊花嘛。这次还不得抓住机会把王力搞掉，把文革派整垮。）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仲尼雷厉风行，分秒必争，不愧是特高科老大出身。计划滴水不漏，凡事都先拿了老毛的尚方宝剑。）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回忆江青同志》）

（革命战士，性情中人。）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回忆江青同志》）

（还是春桥老道：越是处于弱势，越要坚决斗争。这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处于斗争低潮期，更应该坚持斗争。因为，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召唤到同类，才能鼓舞起工友。当然，这只是指斗争意志上的坚定，而不是斗争方式上的盲目。斗争要坚决，但不能蛮干。还是要细心做政工，拉关系，团工友，通过打击小工头积攒经验，壮大力量，再打击大工头，直至整个工厂。直接拉人冲击暴力机器，那是左倾冒险；只发微博求关注搞跪舔，那是右倾保守。）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开局是全国党政资逼大罢工，大部分地方早饭派还没来得及接手。仲尼们也不让接手。老毛觉得军队还是可靠的，于是派军队支持左派，并对早饭派们进行训练，培养战斗能力。仲尼趁机搅屎，把支左变成三支，又加上军管变成两军，于是支左军训便成了三支两军。军内无论是林妹妹一派，还是林妹妹敌对一派，实际上大多为走资分子，因此实施军队支左，实际上就是支右压左。大权被军头们接手，早饭派面临空前危机。关锋发文攻击军内走资派，王力讲话抨击仲尼外交路线。俩人触到仲尼们痛处，这时老毛

选择退守，林妹妹集团暂避锋芒，于是仲尼们顺势拿下王关。文革派一时陷入低谷，但江张依然坚持战斗。从此段斗争我们可以看出军队介入之后，前期文革派领导的早饭派和党政走资指挥的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均势被打破。老毛选择退守，思考应对策略。江张坚持战斗，鼓舞士气。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越是位于弱势，处于低潮，越是要坚持斗争，如此方能斗出机会，斗出力量，伺机翻盘。



## 第七章 猪队友、投机客和逍遥派

---

这一篇来试着解剖三只麻雀：猪队友、投机客和逍遥派。这是在任何斗争中都不会少的三种人。

扯猪队友，是因为在关键时候，丫们危害很大。不是有句话，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么？当我们碰到神一样的对手，同时却有猪一样的队友时，岂不更可怕么？对于猪队友，那就只能用其所长，但不能置于关键位置，尤其不能参与到关键行动当中。否则，我们会死得很难看。本篇要扯的猪队友，就是文革派一员戚本禹。这还是戚本禹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的。我们摆这个例子，是为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由猪队友戚本禹的失误，又引发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是典型的投机客。我们认为，对于投机，警惕是必要的，恐惧就大可不必。有人投机，正表明了自身力量，投机也是增强力量嘛；因为，投机，那也是为了胜利博上一把的嘛。投机的最大危害在于力量趋于衰弱之时，这个时候，就要无情地清理投机者；而且，投机者的面目通常只会在这个时候才充分暴露出来。力量增长之时拒绝投机者，是左倾冒险；力量衰落之时容忍投机者，是右倾投降。文革派处理杨成武果断及时，但对林妹妹集团就警惕不足。

还有所谓逍遥派。我们扯这个事，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而是要表明，在阶级斗争当中，不存在神马逍遥派。阶级斗争是个大漩涡，对立双方都在漩涡里搏杀，都不允许有人站在漩涡外面旁观。看到旁观的，就拉下水，是敌是友，都得下水。是友，那就并肩作战，合力击敌；是敌，那就你死我活，各显神通。杨余傅，就是典型的逍遥派。不过，更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有逍遥派，而只有臆想逍遥派。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运动中，根本就不会存在逍遥派，而只有意淫自己逍遥的派。当逍遥派遭受打击之后，如果就此挂逼，那就是炮灰的下场；如果还执迷不悟，那就还是炮灰的下场；如果挺过来，并且立即明白过来，所谓逍遥都是自己的幻想，那么，就会抛弃幻想，选择站队，投入斗争。因此，逍遥派，最多只是暂时的存在。阶级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要么



是这个阶级，那么是那个阶级。而阶级斗争是绝对的运动，因此，一个人，要么主动地投入战斗，要么被动地被卷入战斗，而不会逍遥于战斗之外。下面，来具体看看三只麻雀。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一犯错，张春桥劝都劝不住啊。还去找仲尼，仲尼估计乐开了花：哪来这么个二货？我们要从这个错误中学习神马教训呢？首先是舍卒保车。舍卒保车则车存，车存则卒存。舍车保卒则车亡，车亡则卒亡，不亡也

散。张春桥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戚本禹真尼玛榆木脑袋。阶级斗争如此凶险，一切以阶级利益为准，神马自尊心，道德感，都是工具，凡阻碍阶级利益，妨碍阶级斗争的，统统都得抛到一边。苦逼本来就处于弱势，还成天背着这些坛坛罐罐，吸食这些精神鸦片，想不死都难。其次是重要行动只找自己的铁杆队友。尼玛仲尼是神马人？即便不能明确是敌，至少不能断定是友吧？只要不能断定是铁杆队友，那就不能把重要行动交托出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第三，铁杆队友的话要多听，多琢磨。尼玛张春桥说这么直白，白痴都该懂了。一次不听伤感情，两次不听伤信任，三次不听你就要被当叛徒，至少是猪队友了。猪队友也好，叛徒也好，从客观上来说是一样的，那就是破坏本阶级利益，损害本阶级斗争。）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再犯错，张春桥再教育。又去找仲尼，仲尼又乐开了花：哪来这么个四货？那么，从这次错误中我们要吸取神马教训呢？首先，信任，不

只是嘴上说的，更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平日里，嘴上说如何如何信任，但关键时候从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是不信任，那实际就是不信任，那就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其次，队友之间要坦诚，有啥都摆到台面上，别藏着掖着；有情报，要及时共享。）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三犯错，江青失去了耐心。戚本禹到死也没明白其中利害，还纠结到底是确有群众江倩，还是敌人伪造；还纠结于神马真相。不管是误会，还是陷害，显然客观上已经陷江青于不利境地，给敌人提供了搅屎的机会。因此，这个时候应该掌握主动，迅速站队，展开反击。反击中犯错误不要紧，要

紧的是根本意识不到要反击，却纠结于神马真相不真相。敌人难道有空跟你来场辩论？这就是我们要从这个错误里学习的教训。同时，整个三次错误也告诉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在阶级搏杀中，不是损人就是损己，至于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根本不重要。无心之失多了，就成了猪队友。猪队友和叛徒一样有害，对待叛徒，无需犹豫，直接肉体消灭；对待猪队友，谈不上肉体消灭，但至少要将其从重要位置上挪开，否则，就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回忆江青同志》）

（戚本禹这样的猪队友，还是先请假休息一下为好。自己好好反省反省，有了长进，再出来战斗。要是没有长进，也不用再归队了，因为只有弊而没有利。）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就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回忆江青同志》）

（碰上这样的猪队友，文革派别提有多郁闷。张春桥已经警告过多次，丫自己老不听，一直没啥长进。到这时，张姚还能出来喊话？丫们能蠢到再把自己栽进去？都这么傻，那还是趁早洗洗睡了吧。）

接下来扯扯投机客杨成武。杨老龟开始是投林妹妹的机。九大之前林妹妹和文革派多半还是联合作战，所以杨老龟也投文革派的机。

在贺龙问题上，杨成武表现积极。林妹妹牵制贺独眼，主要就是依靠杨老

龟。叶群提级是杨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的，罗当时很尴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杨老龟独占了倒贺的功劳。以至于罗长腿连连说：“我考虑不周，我考虑不周”。倒贺自然是大有利于林妹妹的，对杨老龟也是好处多多。文革派也倒贺，所以杨老龟也顺势得到了文革派的垂青。在与罗瑞卿的斗争中，杨老龟和竹叶青出力最多。65年底的上海会议前，杨老龟是到了杭州参与向毛汇报的。此前，关于罗的问题，竹叶青和聂老五给不少自己的老部下打过招呼（是谁授意叶、聂的呢？）在倒罗的问题上，肖华也立了功，但他与罗有私人恩怨。上海会议后，他们三人把罗的职务瓜分了，所以，他们受益也最大。

肖华在文革中倒台，原因种种，但主要的“倒爷”还是杨老龟。肖在西山调戏的女服务员，都是杨认认真真交代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从女服务员手中拿到铁证的。严政委不愿意，杨大骂严。68年初，在京西宾馆，总参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杨老龟安排一干部大批肖华，大喊砸烂总政阎王店。大会还把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等“阎王”拉上台批斗，温玉成坐在主席台上督阵。杨的子女几乎全部到场，坐在会场左前方（现在有几个已是将军）。

在文革中，到毛家湾给林妹妹汇报工作，连叶、聂、吴、李、邱、李天佑等人都要事先报告，同意后才能去；林妹妹只规定杨老龟可以随时去，不必先报告。可见杨老龟深受林妹妹器重。

1967年，老毛视察大江南北，杨老龟随行，负责保卫工作。在文革前期打击贺罗等问题上，杨老龟出力甚多，所以老毛也想着拉杨老龟一把，为文革派所用。老毛有意说，他的讲话可以告诉总理，但不要告诉林。这是老毛略施小计“考验”杨。其实，总理、汪东兴早就告诉林了。当杨老龟见到林妹妹时还对林和叶群守口如瓶，打哈哈（这叫自以为得计）。这下林妹妹可就火了。老毛在外地也不过是对文革的一些问题在“侃大山”，没有什么秘密可讲，虽然期间说了一些批评林妹妹话，但都无关痛痒。杨老龟想搭文革派的船，又要踩林妹妹的船。这下林妹妹的船是踩不成了。于是杨老龟拼命搭文革派的船。

杨老龟回到北京就调兵遣将，搭班子，搞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力颂扬老毛。又在军博搞《红太阳》大型图片展览，大力颂扬老毛，吹捧江青。老毛和江青都有单独大照片，仲尼反而没有。杨余兴未尽，接着又搞《大树特树》……这是一脉相承的。后来，有一个杨因小失大的事（余立金的秘书单士丛（有老婆）与杨的女儿杨易谈恋爱的事，杨为了护犊子，把自己搞的团糟）。

老毛发现，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客，小聪明有余而坚毅不足，难堪大用。对待投机客，有用就用，不能用了就踢。投机客本来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谁有用就吹捧跪舔，谁倒霉就踩上几脚。

前面博文讲到六七年八月份王关挨了老毛批评，后被投入秦城。后来猪队友戚本禹也于六八年一月份受挫。“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回忆江青同志》）文革派势力上升，就各种阿谀奉承。王关戚一朝入狱，丫就落井下石。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投机呢？我们认为，对于投机，警惕是必要的，恐惧就大可不必。有人投机，正表明了自身力量，投机也是增强力量嘛；因为，投机，那也是为了胜利博上一把的嘛。比如文革前期，在倒贺倒罗等问题上，杨老龟固然受益良多，但也是出了力气的。这就增强了无方的攻击嘛。投机的最大危害在于力量趋于衰弱之时，这个时候，就要无情地清理投机者；而且，投机者的面目通常只会在这个时候才充分暴露出来。王关戚被抓，文革派受挫，杨老龟就出来落井下石，丫从行为上背叛了本阶级。因此，这个时候，就要将之打倒。文革派对杨成武的处理就很及时。总的来说，就是能用则用，不能用就踢。因为这也是投机客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力量增长之时拒绝投机者，是左倾冒险；力量衰落之时容忍投机者，是右倾投降。不少人把投机和机会主义混为一谈。投机有利有弊，依时依事而定。机会主义则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所谓机会主义，恰恰是指对正确道路的背离，它要么是以左倾的方式表现为冒险，要么以右倾的方式表现为投降。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对机会主义的批判都是极有必要的。而投机，则既可以是投正确道路的机，也可以投错误道路的机，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对策了。

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职务，同时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原军委常委会及其所属机构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河蟹党屎》）

（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时，临时设置的组的权力，大于受到冲击停止工作的常设机构。当时有很多逍遥派，文革没有触及到这部分人。被斗争推到风头浪尖的，能逍遥吗？杨成武因为骑墙不站队，周和林做出了同样的利益判断：先干掉丫再说！于是周“推荐”杨负责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十个案件有一多半跟老军头有关，接了烫手山芋后杨左右为难，不久就因为“两面派”被搞倒，换上一边倒的黄永胜。此次事件，明显林集团得益最多，力量急速增长。）

黄永胜接替杨担任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负责 10 案：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叶向真案，汪金祥案，解方案，贺龙案，四三案，无线电案，刘志坚案（《河蟹党屎》）

（问：审案要断清吗？答：不必！把鸟捏在手里，是活是死？大宅门里的白景琦用官司把阿胶业务的竞争对手困在监狱里，西门庆靠买卖词讼搞蒋太医。总之，怎么有利于对敌斗争，就怎么来。）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毛泽东传》）

（仲尼老辣，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还为老毛说好话，给自己贴金；又时刻不忘把林妹妹拉出来鞭尸。不过，在倒杨的战斗中，确实是林妹妹积极性最高，攻击力最强。因为丫在杨余傅倒台后获利最大。而文革派，基本上一无所获。无在军中后备力量不足，敌人倒了台，也不能推自己人上。林妹妹则后备充足，一有空位，立马抢占。）

最后，来扯一扯逍遥派。其实我们扯所谓逍遥派，恰恰为了表明没有神马逍遥派。所谓逍遥，只是逍遥者自己的臆想罢了。

这位逍遥者在文革的时候是某造纸厂劳资科的科长。这位科长属于老毛的忠实拥护者，和群众关系都不错。以前收芦苇造纸，湖区有血吸虫，一般干部都不下湖，他就经常亲自下湖收芦苇。结果就得了血吸虫病。按照规定，因公得病有补贴，这位科长脑子太死，说干部工资已经够高，不用拿补贴，结果就被老婆骂鸟。（嗯，据此可以看出，家属是官逼贪腐的最大推动力。）

在文革中，这位科长既没参加造反派运动，也没有参与保皇派。但平日里他口头上是反对官逼们搞特权的，也反对保皇派搞武斗。大概他做干部工资比较高一点，没那么大力去大搞批斗、争利益，但对工人工资不高也是同情的。由于他没有直接参与早饭派，所以走资暂时没有动他。他口头上反对官逼们搞特权的，也反对保皇派搞武斗，早饭派应该及时跟进，拉他入伙。像这样群众关系比较好的，更应该积极拉拢。俺们认为，没把这样的人拉拢过来，这是早饭组织工作上的一个失误。早饭派以为，不应该把他卷入到斗争中来，以免受到打击。事实上，阶级社会不会有无辜者，打击在资复辟后如期而至。

矮子上台后立即把厂长换成了矮子分子。这位科长还是在口头上反对矮子的一些做法（和文革时期一样没有搞大的批斗和大字报），于是就被提前安排退休，从主管采购和招工的超级肥缺的位置挪开。其他采购都赚得盆满钵满，就他啥也没有。晚年每个月一千多退休金，住养老院里。（因为儿子们都和孙子合住鸽子笼）后来又中了风，最终穷困潦倒而死。

这就表明，所谓逍遥派也是不能逍遥的。你不彻底站队，彻底将对手打倒，对方就要打倒你。逍遥，说到底，就是缺乏阶级觉悟。哪有神马逍遥派？激烈的阶级搏杀中，肿么可能有逍遥派呢？哪种人有资格当逍遥派呢？嗯，俺们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力量，因此无利无害的；一种是力量非凡，完全超出矛盾双方的。后一种人，显然不存在嘛。老毛这样的，也只能迅速站队。至于前一种人，倒是有，那就是死人。活人，就有力量。连老弱病残都还是有力量的嘛，也要选择站队的嘛。至于那些号称的逍遥派，实际上只是暂时观望，或者一时不知利益所在，犯了迷糊而已。他们或者被动卷入斗争，稀里糊涂当了炮灰；或者及时醒悟，主动站队投入搏杀。因此，逍遥总是极为短暂的，站队搏杀才是绝对的运动形式。

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逍遥派，确切地说，如何对待试图逍遥的人呢？基本的策略是一拉二打三裹挟。对于本阶级的逍遥派，也就是没有明确站队的，



首先是拉。拉不过来，那就孤立、打击，但主要还是草思想，为的还是拉，在斗争中边打边拉。三是裹挟，也就是将其裹挟到斗争中，“被迫”成为我方战斗人员。不要以为我们拉其入伙是害了他们。首先，丫们的工屁地位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伤害了。其次，老板也没有那么傻，会对斗争中的工屁不管不顾。第三，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阶级情和阶级仇，真切地体会到神马是阶级的利益，真切地领悟到单个工人就是个屁，真切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只有和阶级利益相捆绑，通过集体的联合斗争才能得到实现。对于敌对阶级的逍遥派，也就是没有明确站队的，主要是裹挟。通过使其卷入斗争，从而产生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裹挟敌对阶级的逍遥派，主要是为了制造敌对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便于我方展开斗争，并且有利于扩展我方斗争的战果。

至此，本篇已简单分析了三种人物，当然，仲尼这样的神对手，当然更值得大加分析。关于仲尼，之前我们已经谈得很多，而且以后也还会接着谈。单就他在本篇中的表现来说，也已完爆杨余傅诸人了。那么，如何对付神一样的对手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觉悟，增强自己的认识。再神一样的对手，也只是一个人，离了阶级力量的支撑，照样屁都不是。所以，最重要的，依然是阶级的力量。之前关于仲尼的论述，只是表明仲尼具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阶级立场。如此一来，他必定在走资派踏步前行的路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是我们要对其加以仔细考察的原因。我们要向仲尼学习，学习其立场的坚定，学习其认识的清醒，学习其不择手段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舍此而外，岂有他哉？

那么，同志们，我们是不是得随时琢磨，怎么对待猪队友，怎么应付投机客，怎么裹挟逍遥派，怎么对付神对手呢？我们必须老谋深算起来，我们必须时刻擦亮眼睛，我们必须盯紧利益，因为我们的斗争道路充满了风险。



## 第八章 学生娃退场

高校里的斗争持续到 68 年 7 月。7 月后老毛主张，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制止武斗。走资派趁机搅屎，往工宣队塞自己人，复制刘邓路线，把工宣队搞成第二波工作组。紧接着老毛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学生娃退出早饭舞台。

66 年 5 月文革开始后，校内开展大规模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6 月 8 日，新北京市委派出周赤萍到清华大学，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13 日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会上宣布，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权（《河蟹党屎》）

（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各种回忆录，忏悔录，牛棚杂忆里面提到。再对比看看公开刊行的河蟹党屎中是怎么写的。）

该工作组由刘亲自过问，其夫人王光美于 6 月 21 日以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入该工作组并成为中坚力量。该工作组将从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师等 103 名清华干部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帮爪牙，残酷批斗。（《河蟹党屎》）

（和刘睡一张床的夫人王光美亲自指导清华工作组，这件事情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刘邓在全国各院校派出工作组的目的——高干整高知。老革命干部出面，整理高校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种举动，说明资先锋队在文革开始时，对斗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 57 年反右的水平，认为影响自己执政的是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工作组同时对清华造反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打击。工程化学系 902 班蒯大富等激进造反学生逐步开始激烈反抗。66 年 6 月，蒯提出“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宣称工作组同党委一样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滚出去”（《河蟹党屎》）

（高干一手打压高知，一手打压工农。这一招在 57 年反右刘已经用过了。刘教主不应该忘记：对圣斗士不能使用同样的招数）

工作组迅速对蒯大富进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开除团籍并关押 18 天，将 50 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 500 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两人死亡。7 月，毛回京，斥责工作组做法，要求周亲自过问。21 日，陈伯达派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29 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河蟹党屎》）

（资无的对立普遍存在，才有工作组对蒯大富的专政；在斗争的风头浪尖，老毛没有选择坐视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亲自解放被资打压的无的先锋队队员。难道文革是老毛为了独裁干掉刘设计的局吗？宫廷密史阴毛论的底裤被扒喽！）

8 月 4 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清华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最初多由高干子女主导。8 月 9 日，贺鹏飞（贺龙子）、刘涛（刘少奇女）、刘菊芬（刘宁一女）成立串联会，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即“八九”派，8 月 19 日组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河蟹党屎》）

（高干工作组走了，高干子弟还在。子承父业，可算是家教做的好）

66 年底，兵团在其《井冈山》报上发表清华学生刘涛（刘少奇女儿）的长篇检查，揭露刘、王镇压文革的内情。67 年 3 月至 9 月，井冈山兵团组织或参加了 4 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 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 月 29 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 月 1 日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8 月 22 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运动（《河蟹党屎》）

（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生的女儿，王光美是继母。俺们不能就此认定是家庭不和导致母女反目。刘涛能够从师大女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说明家里对她的照顾和其他子女一样。

（子女贴父母的大字报，长期以来作为文革扭曲人性的一项罪行被控诉。实际上，俺们抛开虚伪的人性，从阶级利益角度来看就会很清楚：父母在明知自保无望的情况下，留下子女作为接班人，以后仍然有翻身的机会。于是由子女出面写批判父母的材料，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

（同样的方法，在《风声》里面两个被抓的地下党之间使用过，在《啊！海军！》空军大队长平田一郎把活的机会留过他的学员们时使用过，在刘整彭的时候彭的亲属使用过，在文革中刘自己家的子女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都从自发上升到了自觉，明白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并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工友不妨问下自己：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66年下半年到68年年中，在此期间，学校学生在各类文革活动挤占下几乎没有正常学习时间。兵团优先招收贫下中农子女，以推荐为主，不招收五类学生：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河蟹党屎》）

（逍遥派、书呆子就是化学反应中的惰性元素，就是维稳的砂子，不参加反应。这样的人群也普遍存在，在中小城市，乡县里面占很大比例。）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是指68年4月至7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动用各种土制武器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夺。共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河蟹党屎》）

（斗殴三个月，每月死六个，这就最严重？群殴随机吧。拿所谓的耸人听闻的“百日大武斗”与河蟹时代司空见惯的富士康“十八连跳”事件对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俺们除了见到郭老板“除了道歉还是道歉”，工友的血作为改

革的必要代价白流了，没见有啥改变！该上坟上坟（俺们管上工叫上坟），该死人死人！）

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毛泽东传》）

（老毛觉得学生仔们不可靠了，还是要依靠工人们。于是就弄个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职责是制止武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龟命们趁机往工宣队里塞自己人，打着毛旗号镇压早饭学生。）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毛泽东传》）

（老毛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给老龟命们站台。）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毛泽东传》）

（老毛继续给自己挖坑，给老龟命们站台。脱离群众固然有早饭学生们主观上不成熟，群众基础不够深厚的原因。但走资们在其中搅屎，也是起了很大

的作用。老毛觉得学生仔没有在斗争中成长为接班人，是前期所抱期望过高，落差太大，此时感觉失望。但为群众不打内战叫好，则纯属搅屎了。阶级斗争，不就是打内战么？利益一致的，在斗争中趋同，所谓殊途同归。利益对立的，在斗争中分裂，所谓敌我分明。至于破坏啥的，阶级斗争还不得摔坏些坛坛罐罐？不过，冲击军队，打解放军之类的，还真不是工农娃娃敢做的。据俺们所知，叶大帅的千金就带人冲过，地方小军头见了也只能把嘴闭上。俺们还知道，赵永夫事件总后台还是叶大帅。叶大帅为走资事业鞠躬尽瘁，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资复辟后叶家享受荣华富贵，那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之事。俺们总是在网上看到很多小资骂叶大帅是权贵。貌似叶家还是所谓十大家族之一。有一派小资左的革命纲领就是要打倒十大家族。小资恨的是权贵，是不劳而获，小资赞的是公平竞争，“勤劳”致富。小资痛恨权贵，是因为权贵们堵住了小资的上升渠道。小资们不妨先看看权贵们的历史吧，丫们哪个身上不是背了重重的血债？没有他们披荆斩棘，镇压一波又一波的早饭工人，杀出一条资本主义血路，哪有小资们的春天？用小资们的话来说，这种仇恨，表明丫们没有一颗感恩之心。）

他出身红五类又是共产党员，被当权派当作依靠的骨干力量，派到一治一中当工宣队员。他因奸污一初中未成年女生，被庇护送出一治一中，搞到干校劳动，免去了刑事追究进监狱的命运，可是他本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对人说：“只是犯了严重错误。”林世念在一治留下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坏名声。我虽不识其人，但久闻其名。就是这样一个人品低下的人，在当权派需要整人的时候又被重用起来，他想立功向上爬。（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

（哈哈，制止武斗的，就是这样的货色。宣传毛思想的，就是这样的货色。被老龟命们搅成这样，老毛怕是要吐血了吧？）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

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毛泽东传》）

（单靠学生肯定不行。学生不掌握生产不行，那就更要到工厂串联嘛，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嘛。把工人弄到学校，方向搞反了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毛泽东传》）

（谁先搞的武斗不管了？别人动手我缴械？反内战，逍遥派，双方厮杀你看戏？哪有那么好的事，统统都要站队，下水。今天，这个结论依然有效。有人说，“市民”们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大家应该共同维护。比如，交通就是公共利益，工人游行不应该阻断交通，交通系统的工人更不应该搞罢工，影响交通运行。比如，电力系统也是公共利益，工人闹事不能破坏电网，电力公司的工人更不能搞罢工，影响居民用电。再比如，城市环境也是公共利益，工人闹事不能乱扔垃圾，环卫工人更不能搞罢工，垃圾回收站的工人要及时收垃圾，也不能罢工。这些市民，不正是逍遥派么？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不是立即就会选择站队么？很多工人被托猪带着上街游行，据说这样能争取舆论同情，获得“市民”们支持，从而给老板和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满足工人的要求。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傻，“市民”们只会把工人游行当乐子看，“舆论”也只不过轻描淡写一番，大伙都来展示一下廉价的同情心。一旦工人行为损害到“市民”们的利益，比如堵路影响交通，就立马被路上开车的“市民”斥为暴民，骂成流氓。因此，所谓逍遥派，只是一时没有站队而已，一时没有被捅到菊花而已。和托猪们不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工人的战场首先就在工厂、在公司，在生产领域。我们作为工人，一面以“劳动能力”拿到工资，一面控制劳动成果的输出，进而，老板能够榨取多少剩余价值，这首先是“生产”问题。这是我们搅屎的理论基础。阶级社会本就不会有公共利益，我们采取行动也不把“法律”作为什么准则，法律只是提醒我们，敌人的力量在哪里，只是让我们评估，我们的力量能否突破敌人的底线而已。阶级社

会没有神马无辜者。比如，一个电厂工人该如何战斗呢？我们要“有意无意”地制造拉闸限电的各种状况，这才是我们的“照章办事”。必须把更多的人卷进来，这是行动的要点。我们无法忍受“市民们”像欣赏马戏一般观赏我们和各类老板的冲突，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整个社会就是大舞台，都是剧中人。市民们抱怨电力质量问题，老板抱怨利润下降，媒体记者，各路公知大声疾呼反对腐败彰显良心，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么？那就对了，如此一来，工人阶级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我们生产一切，控制一切，也就有实力让一切依照我们的意志卷进来，没有无辜者。在学校里的斗争难道不也是如此么？哪有神马逍遥派！统统都要拉下水，非友即敌。）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传》）

（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把学生们弄到工厂去，让工人来领导教育嘛。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让工人们带着机械去农村，领导农民们推进农业工业化，推进农业社会主义化嘛。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要取消神马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嘛。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在军队取消等级制度，恢复士兵委员会，把整个军队制度无产阶级化嘛。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只是掌握一切领域的力量，还要推进一切领域社会关系的无产阶级化。如此，就需要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需要得力的先锋队组织。认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工人们就能自发地完成社会关系的革命，这是愚昧的民粹幻想。但是，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人群众基础，先锋队就能独立完成社会关系的革命，这是十足的官僚幻想。无论哪种幻想，都是小资幻想。先锋队的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群众完成社会关系的革命。为此，就要时刻紧盯社会运动方向，紧盯矛盾发展状态，紧盯敌我力量对比，依据具体情况壮大自己，打击敌人。）

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毛泽东传》）



（知青上山下乡，退出早饭舞台。这一决策的失，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与农业工业化》一文中已有论述。这一决策的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知青下乡，部分成为赤脚医生，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地区的医疗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生命质量。基本的小疾小病得以有效解决。第二点，部分成为赤脚老师，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提升了农民的识字率。基本的小知小识得以有效推广。所谓赤脚，就是半农半医，或半农半师。赤脚医生看病领工资，此外还要参加劳动领工分。赤脚老师也一样，有课上课，课余也要参加劳动。维持赤脚医生和老师的费用很低，完全在农民们的承担范围之内。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地区的医疗和教育的发展，很少依赖国家财政的支持。至于改开以后农村医疗和教育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就不多说了。话说回来，在输入工人先锋和机械力量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取得知青下乡带来的这些好处，而且只会更多更快。）



## 第九章 毛组织撤退

前文说到六八年八月起工宣队进驻学校制止武斗，紧接着知青上山下乡，学生娃们便基本退出了战场。与此同时，老毛开始压制无先锋和早饭派的攻势，组织战略撤退。频频向资先锋们释放利好消息。据左逼们说是因为老龟命们被打的狠了，反击会很厉害，早饭派要全军覆没；而压制攻势，向老龟命们示好，则能保存有生力量，以便来日再战。俺们觉得，这个说法很奇葩。老虎饿了就要吃人，这跟你示不示好没有神马关系。老毛自己都说了，景阳冈上的老虎你摸不摸它，它都是要吃人的。何以对资先锋们就没有这个认识呢？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难道不是常识？在这一点上，老毛还是不够坚决。老龟命们是完全不会领这个情的。很多早饭派后来对老毛有怨言，这是正常的。但是以为老毛的不坚决就导致了整个文革的失败，导致了早饭派的覆灭，这就和左逼右逼们一个路数了。我们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不是哪一个人所能主导的。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纯属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时刻壮大本阶级的力量，依靠本阶级的力量。老毛早就死了，难道我们就不斗争了？这不正是中了左逼们的招了？丫们把毛吹得跟神一样，然后说：看，神都没有打败走资派，我们这些凡人还是省省吧，多活一天是一天。左逼们屁股是资，自然满脑子都是屎。我们得不断去除左逼们灌的屎，否则难免被丫们卖了还帮着数钱。

从 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到 68 年下半年，是“文革”发动以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或被解除职务，或被下放管制，或被关进监狱（《河蟹党屎》）

（庆父不除，鲁难不已。挪开上百个省部级庆父，依然前仆后继说明啥？路线斗争并不偶然，存在广泛的经济基础。远的有支持 59 年打倒的彭德怀派，近的有支持刚靠边站的刘少奇派，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你是哪一派？

（现在不是吗？工友里面有老黄牛派，有混日子派，有搅屎棍派，有逍遥

派，有跪舔派……你又是哪一派？如果不知道先阶级，后左右，就会被人民，中国人，成功人士，慈善家，雷锋，红卫兵这些词所迷惑；如果不会带入自己到历史情景中站队，只是抱着票友和听书的心态寻艳猎奇，就会弱智的认为历史中那些人是傻瓜。其实傻的是他自己！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阶级利益服务？)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传》）

（前面一路看下来，很清楚的是，资先锋领导自己的基础群众率先发动武斗，并对各项革命措施进行搅屎。而早饭派多半只是防卫而已。资群众不停止武斗，早饭派肿么可能放下武器？那不明摆着找死么？六八年下半年开始，毛逐步组织撤退。）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毛泽东传》）

（革命大联合，谁联合谁呢？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能联合么？土共当年还想着和老蒋搞联合政府呢，可能么？“正确对待干部”，表明老毛已经开始全面部署撤退。“消除派性问题”，实际上的结果就是镇压早饭派。从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派性问题，正是东西风激烈搏杀的表现；要消除，就要一方压倒一方。）

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毛泽东传》）

（有后台很正常，基础群众总要在各自的先锋队领导下才能进行有效战斗。无先锋队整体力量处于下风，资先锋处于上风。所以资要领导自己的基础群众率先发动武斗，并对各项革命措施进行搅屎。早饭派多半只是防卫而已。盯紧屁股，盯紧阶级基础，就没啥想不通的了。）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毛泽东传》）

（又一个撤退信号。）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传》）

（信号更加明确，为老龟命重上舞台埋下伏笔。）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

## 序（《毛泽东传》）

（稳腓，是稳谁的腓呢？恢复秩序，是恢复怎样的秩序呢？）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传》）

（老毛开了口子，仲尼顺势扩大。嘿嘿，仲尼总是对“极左”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批就压。诸位可以看看本博《仲尼搅屎录》系列。“我们”就是中央，就是党嘛。“你们”这样搞，不听“我们”的话，那就是反党反中央。“你们”是小资狂热，是完全错误的。诸位，仲尼这是神马？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恐吓么？仲尼就像一只猎豹，时刻盯着对手，一旦对方出现疏忽，便立即出动。）

毛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毛泽东传》）

（不经历激烈的斗争，革新生产关系，又怎么可能壮大阶级力量呢？阶级力量不到，怎么可能整好党呢？阶级力量不到，无先锋怎么可能掌握大权呢？比如，由于受到广大老龟命的抵制，湖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最终就没有能够进入党内。朱红霞如此，其他早饭骨干更是如此。

因此，所谓吐故纳新，说得再好听，也落不了地。左逼们不是说老毛一句顶一万句么？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阶级力量的支撑，所有指示都不过是空话罢了，老毛说的也一个样。）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毛泽东传》）

（革委会里，各占1/3，而且老中青三结合。请问这是肿么设计出来滴？不是斗争出来的吗？民主柿油粉们，肯定说这不科学，应该一人一票选。那斗争的时候，你逍遥哪里去啦？斗完了你想摘果子？没门。不过话说回来，革委会依然是资占上风，整体上受资主导。这个也对应于阶级斗争中的整体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战况。）

到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成立，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毛泽东传》）

（革委会本身是斗争的产物。虽然在革委会里无依然处于下风，但好歹楔入了自己的力量。关键的问题是，建立革委会就完了么？宣告斗争结束？还是再接再厉，继续斗争呢？力量的变化永远是动态的，无不斗争，革委会就要完全沦为资的机构。无继续斗争，则有可能把革委会往有利于无的方向推进。）

国务院各部委精简后，保留人员最多的也只占原来人数的40%多一点，最少的则只有7.8%；大多数省级革委会刚成立时，都只设政工、生产、办事和保卫四大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至200人，为原有人员的1/20或1/30（《河蟹党屎》）

（可见所谓管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砍掉 99% 以上的经理老板和官员，不影响完成经济发展计划。老板之所以保留甚至鼓励发展很大一部分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工友不妨对照一下河蟹的三十多年历史，俺们几乎可以一字不差的照搬上文——“从河蟹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土地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承包给农民，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 DXP 南巡后推动股市和发行企业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大地产商出面把城市住宅卖给自己的主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主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又不是文革派的，拉人来给自己打打气都不行了？）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

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毛泽东传》）

（斗争的成果需要事后的程序进行追认，就叫做“合法化”。而不是先想着修改法律，争取什么鬼“罢工三权”力，再去抄家伙干。

（所谓“法不责众”的意思是：法是对力量的追认。当人数变多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于是法依照新的力量对比，追认这种“众力”为“合法”）

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毛泽东传》）

（就像火山熔岩喷发冲出地面，冷凝后形成的岩浆岩一样，力量对比决定用什么样的政权政体来调和阶级矛盾。爱不爱国，不妨先问问，国是谁的。孔老二认为国是淫民的，可这个淫民又是一大筐菜：小业主，小老板，小资……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揭过他们虚伪的面具了，清晰的帮他们总结了自己躲躲闪闪、缠杂不清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孔老二就说农民工要拥护政府相信 D，因为讨薪最后还要由政府出面搞垫！），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 GNP 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比如首富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红十字会），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毛说：“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毛泽东传》）

（屁股不一样，手举再高也是白搭。这一点老毛心里清楚的很。）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毛泽东传》）

（老毛主动承担错误责任，明显是释放妥协信号。）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毛泽东传》）

（林集团与文革派继续保持进攻，毛老压制攻势。）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

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传》）

（虽然组织撤退，释放各种对走资派的利好消息，但依然要把文革的必要性肯定下来。这也为以后再发动进攻埋下伏笔。）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毛泽东传》）

刘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是“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而奔走呼号”；刘在对资工商业改造中“坚持放任资发展的反动政策”，“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自由泛滥；刘“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复辟资。（《审查报告》）

（恩格斯：“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

刘鼓吹“流通决定生产”，反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计划经济，是从流通领域破坏社建设；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搞资复辟的宣言书”等等。认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审查报告》）

（恩格斯：“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

17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学术“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向无实行反革命的资专政”，等等。（《审

查报告》)

(斗争从来都是反复的。关峰，王力，戚本禹“被休假治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遭到清算——这是低谷；文革小组抓舆论批刘的反动路线是深入教育群众的妙招儿——这是高潮，然而文革小组放松了在省市县乡革委会里进一步建立基层先峰队组织，任由基层组织依然由资的代表盘踞，因而埋下了日后覆灭的隐患——这又是低谷。)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毛泽东传》)

(林集团与文革派继续保持进攻，欲将剩勇追矮挫这个穷寇，老毛再次压制攻势。)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毛泽东传》)

(老毛在确认文革必要性的前提下，逐步组织撤退。)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毛泽东传》)

(老毛这是要发扬一下举贤避亲？左逼们又要高潮了：看，这才是伟大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圣人；看，这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圣洁的统治者；看，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伟大领导者。在我们看来，这个很扯淡。不积极争取也就算了，完全没必要刻意打压嘛。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推选好了嘛。老毛首先看的竟然是他们的亲属身份，而不是无产阶级战士身份。我们说，江青也好，小毛也好，首先是无产阶级战士。至于和老毛神马关系，那是次要的。既然是无产阶级战士，那当然要进入权力机构，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老毛舍阶级大义于不顾，却考虑神马避亲属之嫌，差评。左逼们所谓的高风亮节，在我们看来一文不值；而在其有损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实现时，则完全是有害而无利。）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毛泽东传》）

（有的说，取消中央文革，就等于宣告文革结束。但是，矛盾解决了么？既然矛盾依然在，斗争可能停止么？只是换一套方式继续斗争罢了。）

69年4月1日至24日，九大在北京举行。1512名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预备会期间，毛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河蟹党屎》）

（革委会不是由中央认定的正式机构？上级部门不是正式机构？再说，这些机构只是“决定”“指定”候选人而已。候选人当选，还是通过正常程序的嘛。早饭骨干、工农积极分子当选就不正常？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没有前期激烈的斗争，这些人根本连候选人资格都不会有，更别提成为代表了。即便如此，成为代表的无产队员依然是少数。大部分人，依然被“正常”的资组织拦在门外。）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当选为副主席，周为秘书长。（《河蟹党屎》）

（一般情况，五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次八大是56年开的，中间隔了13年，开了12次会议。九大召开，是对十年文革第一阶段的总结，对两年多来的斗争予以制度法规追认，赋予合法性。）

“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革”的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林宣读政治报告（《河蟹党屎》）

（对比看一下辛亥革命前后，就知道为啥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因为阶级关系毫无变化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照着这个标准来判定文革的具体性质：它触动了根本的生产关系么？它推进各领域社会关系的革新了么？它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了么？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联合了么？它不断地消灭着各领域的资本主义关系、小生产方式么？如果有，那是在多大程度上呢？我们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不只是一个阶级的人和另一个阶级的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也是破除并消灭旧生产关系，催生并推进新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一切社会关系的变更，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同样是如此。其过程，就是有血有肉的、你死我活的鲜活而残酷的阶级斗争。）

草案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加上“林同志是毛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河蟹党屎》）

（哈哈，生产力，生产力。我们批唯生产力，实质是要批邓挫们的资立场。谁都知道要发展生产力，邓挫们却是要以此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我们，当然是要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现代化也是如此，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单纯提现代化，就是搅屎用的。)

讨论中充满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革”的高度颂扬。各组还结合文件内容，大搞“斗私批修”，对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和攻击，迫使他们作检讨。4月14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河蟹党屎》）

（左逼们大赞斗私批修，认为文革就是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右逼们大骂斗私批修，认为灵魂深处闹革命是毁灭人性，扼杀灵魂。看，左逼右逼们是不是一伙的呢？在我们看来，所谓斗私批修，核心在于改造私有制，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各种小生产。这是根，而批修是理论上的批判，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无不是服务于社会关系的改造这个大本的。这才是切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运动。至于左逼右逼们争吵不休的斗私批修，那和参禅打坐、吃斋念佛没啥子区别。)

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选出委员170名，候补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19%，仅为原八届委员会总人数的2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河蟹党屎》）

（辛亥革命可以比吗？清朝大吏90%成了民国大员，是革命吗？还有搞笑的事，前面师爷不是嚷嚷着要搞正常程序么？肿么有的代表违反正常程序呢？肿么丫们违反正常程序就成了坚持原则了？)

九届一中全会，委员会主席毛，副主席林。政治局常委会5人毛、林，（姓氏笔画）陈、周、康。政治局委员21人：毛、林，（姓氏笔画）叶群、叶、刘伯承、江、朱、许世友、陈、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康、黄、董必武、谢。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河蟹党屎》）

（九大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一共25人，其中无6：毛，康（1975.12），江，张春桥、姚、谢富治（1972.3）资9：周，叶，朱，许世友，陈毅（1972.1），陈锡联，李先念，李雪峰、李德生。军6：林，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黄永胜。修正 2：纪登奎，汪东兴。逍遥占位 2：刘伯承，董必武。)

许世友，陈锡联，李雪峰、李德生，四个军区司令员，都在文革期间被周力挺，又分别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负责各省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李先念在“文革”后期，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河蟹党屎》）

（仲尼对资有重生再造的大德）

九大政治局通过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中央军委主席；林、刘伯承、陈、徐、聂、叶任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河蟹党屎》）

（九大无疑是林集团的力量巅峰。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掌控军队。文革派在军中依然没有多少力量。谢富治早早地在 72 年去世，是无的一大损失。资方依然占据上风，从中央到地方，从革委会到军队，资利益代言人星罗棋布。）

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河蟹党屎》）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文革小组被取消，那就换个形式再斗争嘛。）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毛泽东传》）

（有职无权。那么，接下来要怎么斗呢？）

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毛泽东

传》)

(还是要紧密联系本阶级的群众组织，积攒力量。)

纵观这一阶段，老毛明显是在组织撤退。我们说，战略撤退只能服务于更好地组织进攻。选择撤退，无非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进行更好的斗争。如果撤完之后却没有接着再发动进攻，那就不叫撤退，而叫投降。而且，即使是撤退，也需要进攻作为火力掩护。不保持进攻，就不可能完成战略撤退，而只能成为大溃败。后面我们会看到，无方当然没有停止进攻。但是斗争偏离了主线，没有寻找战机，没有积极训练厂矿先锋队，准备再次权力争夺。我们一直强调，壮大自己的力量是首要的。

现在可以对九大为止的战斗做一个小结了：

在初期的混战中，资先锋队由于认识不清楚，误伤同盟——地富反坏右派、高知；当倒台的资先锋队队员与斗争初期被他们整倒的同盟关在同一个牛棚劳动时，才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反动，没落贵族，酸文假醋，可其实和自己是一伙的！虽然这家伙出身丘八，趾高气昂，可同自己是一道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双方在文革中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思夜想，等待变天！

总有人拿“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文革初期打倒的超过总数的一半”说事，意思是迫害、是残酷。不如调查一下，是不是几乎所有单位十年内的员工流失率都超过一半?! 尼玛前者是迫害、是残酷，后者就是自由选择吗?!

工友就是战友，苦逼就是利益集团。苦逼做事，经常先想的是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有这样的想法，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利益集团成员；这一点上，苦逼要向老板学习：老板做事，从来都是先想有利没利。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于是苦逼在工厂里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夜谋划，改天换日！

无的先锋队没能深入革命原因有三个。第一，无力量的事实削弱。斗争初期倚重的林集团，与文革小组分道扬镳，由九大前的秘密走向九大后的公开。第二，资力量空前团结。如果说文革初期，资由于认识不清，误伤友军的话，九大已经给所有的资先锋队队员敲响了警钟：不夺回权力，就会被无镇压。第三，



中苏对抗的外部环境，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压下。



## 第十章 清洗早饭派

在老毛组织撤退的时候，走资派们逮住了机会，发起大清洗。左逼右逼们一天到晚斥责斯大林的大清洗，控诉老毛的法西斯。我们倒是觉得老毛太心慈手软，而老斯又不够阳光。阶级斗争，首认经济屁股，首认阶级立场。其余皆为次要的考虑因素。斗争就冲立场来，为的是革新阶级关系。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指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对走资派展开你死我活斗争；同样，走资分子的斗争是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对早饭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前文说到，六八年下半年起，林集团外的各路走资开始觉醒，斗志高涨，空前团结，力量急剧上升，本来就占上风，此时取得压倒性优势。毛正是看到这一边倒的形势，所以选择战略撤退。但丫们并没有给早饭派喘息的机会，而是立即展开清洗。同时，林集团也没有闲着，早饭派照样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丫们也积极地参与到对早饭派的镇压当中。清洗一轮接着一轮，六八年末开始借清理阶级队伍之机清理早饭派，然后是在“一打三反”（1970年春广泛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中把早饭派打成反革命，再接着是“两清一批”（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一轮比一轮残酷，三轮清洗之后，早饭派死的死，关的关，基本上被一网打尽。早饭运动陷入最低谷。这个过程中，文革派并没有采取神马有效的反制措施。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

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曾思玉、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

从此，整治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悲欣交集话文革》）

（哈哈，“周总理主持会议”。六八年八月就开始整早饭派，算是大清洗的前奏。仲尼随时压着文革小组，江青有话说不出。对仲尼来说，这个会无论如何是赚的。因为曾刘是林妹妹集团的，那么会上就是林集团和早饭派之间的撕逼。压一下早饭派，可以卖个人情给林妹妹，顺便给曾刘打打气，从速从重清洗早饭派。曾刘当然不会傻到看不出来这形势，于是开完会后立即采取行动，抓捕早饭骨干。）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以后，一治造反派已经掌握了实权，成立了自己的生产指挥部，也解放了一线抓生产施工的领导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比七二前造反派被打得无家可归好得多。（《悲欣交集话文革》）

（抓好革命，自然促进生产。文革期间生产形势最好的时候恰恰是早饭派掌握生产的时候。这样的所谓动乱不是好得很么？仲尼们也促生产，那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仲尼们也抓革命，那是抓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仲尼们

以促生产为名，来压革命，就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压制社会主义革命。)

曾、刘首长派空军一个姓张的团参谋长带了一工作组到一冶“支左”。他们一进一冶，开始和造反派头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还帮助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他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一冶的主要头头都请到洪山宾馆住下来。另一方面，向一冶下属的十几个县团级企业也派出“支左”领导小组，开始各单位只派几个人，后来就偷偷不停地增加人员。又派7252部队的一批人将空军的张参谋长换走，从各级领导班子里面不声不响地全面夺了造反派的权，开始对一冶实行全面整顿，重点是为了打击我。(《悲欣交集话文革》)

(支左套路：先礼后兵。所谓礼，那就是客气地把早饭骨干请到宾馆，参加学习班；不用参加生产，有吃有喝，多好。所谓兵，那就是直接抓起来，投进监狱。礼也好，兵也罢，都是把早饭骨干隔离出来，把自己人塞进去占坑。)

1968年10月，派到一冶支左的师级干部叫于合，他来一冶根本不找我，一直在幕后指挥。他派一个姓杨的参谋长和我们打交道。我们称杨参谋长为“杨四号”。“杨四号”很和气地向我征询对一冶干部的使用意见，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一冶解放干部可以选用三人：一个叫卞道科，是位正处级干部，他干事认真负责，有长期领导施工的经验。第二个叫王长财，也是工人出身的处级技术干部。第三个是原一冶负责施工的副经理王秉政，但要做好他的转化工作，取得工人群众的谅解才能使用。我的意见，在成立一冶革命委员会时基本上被支左的军代表采纳。卞道科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长财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常委，几个月后，王秉政也被任命为一冶抓生产的主要负责干部。但是，一冶革命委员会结合群众代表的人选，他们完全不问我，而是暗箱操作。一冶军代表和省委部分领导策划，拼凑了一个把我和一冶主要造反派头头完全排除在外的“革委会”。(《悲欣交集话文革》)

(哈哈，这就是革委会的成色。老毛不还说要军人主导么？不是说要学习解放军么？这下真是如了他的愿了。)

一冶成立革委会那天，我被软禁在学习班里，外面锣鼓喧天，我却蒙在鼓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看到了一冶革委会的成员名单，觉察到几个问题：

军队干部开始在一冶造反派中揪坏头头，他们开始算我们揪刘丰、通牒警司、揪幕后黑手的罪行，这个坏头头就是我曹承义。

一冶革委会的成立是在中央召开“815冶金工作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上，武钢就揪出了坏头头胡启生、张克勤等人。

曾思玉、刘丰等这时已经成为林彪死党，陈再道、钟汉华的第二，林彪体系的军人政权对文革及造反派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悲欣交集话文革》）

（对待早饭派，林集团丝毫不比仲尼们手软，其残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待党政资，林集团更是比文革派毒辣百倍。）

一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代表从来也不尊重被他们挑选出来当陪衬和摆设的造反派代表，凡属重大问题，都是军队干部或几个人事先研究，然后就作出决定。有时提交一冶革委会通过，不过是一种假象。一冶革委会只是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一块招牌。革委会刚成立就名存实亡。军代表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敢于在各种场合为造反派群众讲话，这是军代表没有预料到的。（《悲欣交集话文革》）

（左逼们把革委会吹得神乎其神。在左逼们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革命委员会”嘛，革命嘛，多好！这就是左逼们的臆想。）

1968年10月底，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工人、学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曾思玉、刘丰自以为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揪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李迎希、孟夫唐、刘真、张华等革命领导干部，又开始整造反派了。（《悲欣交集话文革》）

（嘴上宣布胜利，实际开始撤退。）

六八年十月，毛泽东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毛泽东传》）

（哈哈，老毛认为的清理阶级队伍竟然是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而对日益壮大的走资分子不闻不问了。我们认为，死老虎打一打无妨，但更要打击活跃着的、并且日益壮大的老虎。不过，河蟹师爷照例是要把走资们清理早饭派所造成的“风声鹤唳”、“动荡不安”描述为文革派到处制造冤假错案。比如，“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毛泽东传》）俺们要问：谁导致了谁非正常死亡呢？）

1969年元月，我被一冶军代表称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到驻扎在湖北应山的7252部队营房，开始了五不准的“学习班”。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进了“牛棚”。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全面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秋后算帐，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文化革命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他们夺了权，他们才真正是篡党夺权啊！把我从武汉、从一冶赶到农村、军营，军代表“支左”的内容就成为彻底打击、镇压造反派了。一冶一切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在这些“支左”的军人支持下又死灰复燃、全面复辟了。

文革有一个真相被后来的主流媒体扭曲，说什么造反派用关牛棚的手段伤害了許多人，伤害了許多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其实在湖北、武汉，恰恰相反，这些事全是官方干的，有不少是军代表干的，或是官方以各种名义操纵保守派一些打手干的。干这些事的从来不

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一直被当权者和保守派看作是“牛鬼蛇神”，所以把造反派头头、文革的骨干分子和所谓的“牛鬼蛇神”一起都关进了牛棚。我在应山军营牛棚被隔离关押、管制，和“牛鬼蛇神”编成一个班。早上起床“斗私批修”，背诵“老三篇”，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如同苦役。我为之奋斗的“革命委员会”成了镇压我的专政机构。（《悲欣交集话文革》）

（党政军走资派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是属于内部斗争；丫们整早饭派，那是敌我矛盾。改开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平反，重享荣华富贵。官商握手言和，一起发财。资复辟的改开大道上，党政军保驾护航，各路资冲锋陷阵，师爷们歌功颂德。然后又联手镇压清洗队伍中残留的早饭分子，联手谱写“大动乱的十年浩劫”史。这个地球上，恐怕从来没有，也不会再有河蟹师爷这样齷齪的物种了。）

正在党的九大隆重召开的时候，大约4月底，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鲜血为人民》传遍湖北省、武汉市，“反复旧”斗争在武汉已成燎原之势。武汉造反派群众在全市举行火把游行。在应山军营武钢、一冶学习班庆祝“五·一”大会上，有人偷偷告诉我武汉正在“反复旧”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中央已经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请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解决“反复旧”的问题。我立即决定返回武汉，参加“反复旧”斗争。

几天后我在武汉投入了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活跃在武汉和一冶的斗争前沿。中央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5.27指示”发表以后，在军营办学习班的“牛棚”也跟着垮了，学习班也彻底失败了。但是曾思玉、刘丰又开始利用中央批评武汉“反复旧”的“5.27指示”和批判“北决扬”的“9.27”指示，肆无忌惮地镇压造反派。他们大整黑材料，在全省抓“五一六”“北决扬”，把数十万人打成了反革命。（《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见缝插针，办学习班就是个说辞，实际就是软禁早饭头头，把他们统统隔离开来。早饭群众群龙无首，组织程度直线下降，战斗力自然跟着下滑。

所谓“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思想异端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这个群体没神马组织性，松散的很，规模也很小，没多少人。不过，这并不妨碍走资们把它打造成有后台、有纪律、有纲领的反革命组织。然后，就可以借着清查北决扬的幌子围剿各路早饭派了。

所谓“五一六”，本来是指一个叫五一六兵团的学生组织，后来被走资们搞成遍布全国的反革命组织。清查规模要远远超出对北决扬的清理。成为早饭派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也是整个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清洗。河蟹把刘少奇案吹成文革第一大冤案，俺们觉得很可笑。

1967年夏天，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为首的一批大、中学生，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但此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制止。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从此揪“五一六”掀起新的高潮。1970年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清查中，“五一六”的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成为祸及全国的特大冤案、假案。在各地实际上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为主要清查对象，在清查中大量出现严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难以统计。据称，在清查“五一六”中，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

看仲尼一路的表现，不难发现丫的资屁股。五一六兵团炮打仲尼，肯定是窥见了丫的资屁股。早在工作组时期，就有不少学生看出了仲尼的屁股，在运动中打出批周的标语。五一六兵团也只是个代表，肯定还有其他人看破了仲尼的真实面目。但肯定没有几百上千万的规模。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中央命令已经下达，“五一六”就是筐，啥都往里装。由此，走资派疯狂清理“五一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场清理运动，仲尼集团和林集团都积极投入。不过，林集团在九一三覆灭。而仲尼集团则笑到了最后。林集团覆灭后，不少受林集团镇压的早饭派又重见天日，恢复斗争。但不久就又陷入仲尼集团的罗网。正所谓



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曾思玉、刘丰在武汉文革中，从来没有真正批判过一次刘少奇、王任重，从来没有搞过真正的革命大批判，而是大张旗鼓地把斗争的矛头向下，打击革命的群众，打击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头头。在“两清一批”中，他们总结出“上联刘，下连牛，中间火烧头”的经验。向上联系刘少奇是假，向下连接牛鬼蛇神是真，“中间火烧头”就是叫造反派头头自己整自己。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后，全部人员回到各自单位。我被一治赶到汉阳县西南边水洪口附近的一治五七干校报到，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湖塘野地施工建平房，搬运砖瓦沙石，与一治广大造反派群众隔离。而背后，军代表则继续抓紧整我的黑材料，准备将我按坏头头抓捕。这时，一治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头头，已经被他们整的整、抓的抓、关的关、赶的赶。他们为此用尽了一切手段。“支左”的军代表和被他们“解放”的干部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天堂，一切都与造反派无关了。他们拆除各处的大字报栏，用消防车高压水龙去冲洗、清除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的痕迹，用红色的油漆涂满他们想覆盖的一切地方，大搞所谓的“红海洋”。(《悲欣交集话文革》)

(曾刘都是林集团的成员。趁机下放早饭头头，跟办学习班一样，都是为了把骨干和早饭群众隔离开。要说走资内斗，那也是林集团和其余走资斗得最凶。所以河蟹党屎坚决把林集团打成反革命，并将其与文革派捆绑定罪。除林集团外的一切资分子都可以平反，并且也得到了平反。话说回来，确实林集团给党政资造成的心理阴影要远远超过文革派。带枪的敌人，虽然是阶级内部敌人，那也是你死我活的，那要比不带枪的外部敌人更有杀伤力。)

纵观这一阶段，早饭派承受仲尼帮和林集团的双重围剿，连防守之力都没有，遑论还手之能。文革小组取消，文革派虽成为委员，却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最重要的军事、经济、组织各部门依然掌握在两派走资势力当中。老毛也还没琢磨出更好的反击之道。早饭斗争进入最低谷。此后，文革派积极投入与林集团的斗争，仲尼帮入伙，联手促成了林集团的覆灭。林集团覆灭，文革派趁势发起进攻，但只掌握宣传部门，所以没能对仲尼帮造成实质性伤害，也没能迅

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导致了最终的败局，这是后话了。



## 第十一章 经济战线的斗争（一）

---

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

神马叫经济就是政治呢？经济的核心是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合体。生产关系意味着阶级关系，生产力意味着阶级力量。因此，经济，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没有神马单纯的发展经济，一切都围绕着阶级关系的变更、阶级力量的消长、阶级利益的损益。阶级关系的变更、阶级力量的消长、阶级利益的损益，直接决定着政治的性质。或者说，政治的内容，也无非是阶级利益的损益而已。

神马叫政治就是经济呢？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啥意思呢？所谓集中表现，就是敌对阶级分别组织起来，进行搏杀，而不再是零敲碎打。“集中”的关键，就在于组织性；而其表现，则是成熟的先锋队的出现。成熟的先锋队本身就是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拼杀出来的。因此，出现了成熟的先锋队，阶级斗争就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列宁又说，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政治斗争的表现就是对于政权的争夺。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阶级社会，没有神马普遍利益，只有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落到根子上，就是生产关系；阶级力量，落到根子上，就是由阶级所掌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组合，就是生产方式，这是经济的本质。因此我们说，政治就是经济。

政治斗争，就要解决政权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落实为生产力的革命性推进，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总之，是生产方式整体的革命性发展。当然，这是指革命阶级的政治斗争。如果是反动阶级的斗争，那就是阻碍生产方式整体的革命性发展，维持并巩固落后的生产方式。

如此一来，在经济战线的资无斗争，就应当成为文革阶级斗争的核心。资无双方都清楚：经济是命门。从前面《仲尼搅屎录》已经看得很清楚，走资一直牢牢掌握着经济战线斗争的主动权。所以到文革时期，无方其实处于很被动的地位。无先锋在经济战线投入的力量也无法和资力量相比拟。而且，我们将

看到，在这个关键战线的斗争中，无先锋出现了不少失误。本文简单谈一谈70年到72年资无双方在经济战线斗争的得失。

70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分别召开全军和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至71年，在基层组织恢复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省级党的委员会。整党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遏制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河蟹党屎》）

（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资重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的过程，就是清洗早饭派，释放各路资的过程。）

“教育革命”在毛看来，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于是，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党组织；农村中、小学则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河蟹党屎》）

（校长和教师从来就没有起过主导作用。意识形态，科教文卫，上层建筑，都由经济屁股决定。学校注定了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工人阶级能否真正领导教育，还是取决于无是否掌握自己的工人群众，组织起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点，前面也说了。不是要工人跑到学校去，而是要学生进到工厂来。学校就建在厂区嘛。学生也得亦学亦工，工人也得亦工亦学。教师也一样，亦师亦工。在共同生产中、在共同学习中、在共同斗争中打成一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8年12月，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青年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河蟹党屎》）

（上山下乡的得与失，前面的文里都已有所论，此不赘述。）

“五七”干校。干部下放首先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河蟹党屎》）

（削减95%的管理人员，地球没有不转。正是在共同下放到干校期间，走资们才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反动，没落贵族，酸文假醋，可其实和自己是一伙的?! 而高知们也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丘八，趾高气昂，可同自己是一道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双方在文革中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思夜想，等待变天！陈小鲁出来代表河蟹先锋向高知分子们道歉，不正是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表现么？不正是对之前的误打误杀表示歉意么？双方现在不是如胶似漆么？你用枪杆子捍卫资的利益，我用笔杆子捍卫资的利益，合作愉快！）

除少数大、中城市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工厂外，多数地区的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高等学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70年12月至次年1月，“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召开，认为“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河蟹党屎》）

（高干高知下放劳动，可以算无方的小胜。不过，在仲尼们的积极搅屎下，高干高知还是享受原先的待遇，工资保持不变。参加劳动，正是给高干高知们去了三高，让丫们得以在资复辟后尽享胜利果实。）

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的无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专了无的政”；大多数教师和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的”。（《河蟹党屎》）

文革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根据毛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70年6月，党中央决定进行试点恢复招生，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河蟹党屎》）

（文革中无才夺回来教育领域的部分权力，学校开始培养无的接班人，为无服务。）

“四五纲要”总要求：“四五”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河蟹党屎》）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带来资无关系的新问题。文革初期无先锋队是靠宣传文教打开缺口，中期在生产斗争中失去了根基。）

70年我国经济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河蟹党屎》）

（不是控诉文革天下大乱嘛！咋滴还超额完成计划呢？生产力指标，涨不涨工资，重轻农还是农轻重，这些经济斗争从建国后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重大的政治任务。经济，就是政治。）

根据“四五”计划，1970年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在年内完成（《河蟹党屎》）

（“五小”工业指地县两级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在无主导的形势下，要往国营方向推进，算是无的后备力量。改开后成为乡镇企业，但很快就转变为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



69年8月，首钢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此后，钢铁会战，汽车会战和拖拉机会战在各省展开。到70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均称已能“成批生产”汽车（《河蟹党屎》）

（革命竞赛，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资看来是缺乏计划，是混乱和损失。）

资认为：重工业生产增长过快，农、轻和非生产性建设积累过少；内地建设挤占大量资金，布局分散，管理混乱，挤占发达地区资源；片面强调“自成体系”的建设，阻碍了各地“相对优势”；产品质量下降，造成浪费和损失；职工人数增长过快，出现工业、基建与农业争劳动力，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增加了负担（《河蟹党屎》）

（相对优势，庸俗经济神教的药方。周从建国以来，就是“爬行哲学”的坚定代表。认为经济发展顺序应该是农轻重，中国农业有劳动力优势啊，应该出口换外汇啊！尼玛没有重工业，怎么农业现代化？没有机械取代人力，没有化肥育种，怎么高产稳产？

（寄希望于国际市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只是纯经济路线吗？不是，是政治。以城市吃粮人口多为由，削减一半国企工人，就是为了削弱无的力量。培养小农经济，小生产来瓦解公社，就是壮大资的力量。城里的工人难道是白吃饭的吗？造的农业机械不是加快农业建设吗？

（周打上半场，邓打下半场，都是资的带头人。）

71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完成。同时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河蟹党屎》）

（工人阶级革命竞赛，热情高涨；力量迅速壮大。庸俗经济学拥趸仲尼及时地伸出黑手，削足适履给经济大脚穿货币小鞋。问题恰恰是，仲尼们只要把

庸俗坚持下去就够了。工业体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工人阶级血汗堆出来的。工人阶级不仅要通过生产把工业体系干出来，而且要通过斗争牢牢把生产力掌握在本阶级手里。如此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形成良性循环。）

70年3月初《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截至9月底，工交部门直属的3082个企事业单位，已下放2237个，占总数73%，撤销的有104个（《河蟹党屎》）

（对照现在的央企，就知道当时资是多么不愿意下放，就明白横加指责的原因了。）

三线建设出现了65年以来的新高潮。69年3月，连接中南、西南的铁路干线——由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动工兴建。9月，二汽在湖北十堰市开工。11月，河南焦作至广西柳州的焦柳铁路动工。70年7月，纵贯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72年4月，甘肃西北铝加工厂建成。11月，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通车（《河蟹党屎》）

（这个靠小农小生产积累，没有重工业，猴年马月才能搞出来？）

三线建设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和民工排除万难，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三线建设，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面，为以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河蟹党屎》）

（根据庸俗经济学的相对优势理论，那西部就应该穷，提供劳动力，东部就应该富，提供资本机器，这样就可以发挥“相对优势”喽！背后是劳动力商品的流动和市场的壮大，这就是资打的算盘，可惜在那十年，完全行不通，资能不捉急吗？三线建设是有利于无的一个正确决策。不过，资复辟之后，市场经济的逻辑横行无阻，“比较优势”终于见了天日，三线也就毫无悬念地逐渐没落了。）



67年至68年间，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工分挂帅”一些地区减少或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大寨大队，被树立为“继续革命”的典型。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及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经验成为全国农村的榜样（《河蟹党屎》）

（没有物质刺激?! 那还咋先富带后富呀?

（根据统计，全国 $\frac{1}{3}$ 的公社发展迅猛， $\frac{1}{3}$ 的公社发展缓慢， $\frac{1}{3}$ 的公社发展落后。资的办法是想方设法扩大后 $\frac{1}{3}$ 的比例，瓦解公有制基础；无的办法也是依靠基层先锋队力量，带动前 $\frac{2}{3}$ 的公社发展。

（以改开第一村“小岗村”为例，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年收获粮食13.3万斤相当于其以前15年的总和，俺们真的很惊诧和惊叹：15年年均亩产才17斤?! ——这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奇葩案例！然而资专政下，就可以把这样的落后典型捧为致富圭臬，发家典型！）

70年8-10月，国务院在大寨、北京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以“农业学大寨”为号召，但实际上却对大寨的做法限制和否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会议强调，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反对平均工分；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灵活种植（《河蟹党屎》）

（朋友们，请注意，是“国务院”！国务院是个啥子院，大伙很清楚了吧？嗯，再来说一下资的策略，丫不是傻傻地端上来一盆屎，而是你端上来一锅汤，丫就往汤里放几颗屎。嗯，俺们管这样的行为叫搅屎。那么，在老板专政下，就该我们搅屎了。我们要时刻找机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往老板们的汤里放屎。老板的汤是啥呢？利润，利润，利润。给老板生产利润制造麻烦，实现利润制造麻烦，扩大再生产制造麻烦，给老板的整个以利润为生的秩序制造麻烦，这就是我们的搅屎活动。）

三线建设，使地方建设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为支援地方“五小”工业，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设备：70年，

上海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为各地制造 100 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各省、市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设备（《河蟹党屎》）

（生产资料，直接按计划划拨。嗯？竟然是划拨而不是买卖?! 资表示理解的不能）

文革对城市经济影响较大，给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拾遗补缺的机遇。社队企业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这在沿海一些地区尤其明显。70 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为 67.6 亿元，是 1965 年 29.3 亿元的 2.3 倍。不少社队用办企业所得利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的发展（《河蟹党屎》）

（利润竟然不归老板，而是投入到集体经济中?! 生产力大幅提高后，势必产生小生产，小业主，小资意识就会抬头，就会寻找利益代言人。无的基层先锋队，需要保持清醒，坚决的与这种意识做斗争，才能够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不仅如此，还要及时地将一定规模的集体企业纳入国营体系当中。当然，前提还得是无自己牢牢掌控国营企业。）

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增收，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人才，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 80 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一些地区的“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也存在着诸如消耗大、成本高、原料缺少来源、一些产品没有销路、新增职工过多等问题（《河蟹党屎》）

（哈哈，走资带着放大镜到处找问题！最让仲尼耿耿于怀的是“新增职工过多”，在丫眼里，知识分子是需要促膝谈心照顾的，工人就是吃闲饭的。改造知识分子是需要和风细雨，下岗工人就雷厉风行。工人阶级不积极干，难道等着天上掉工业体系下来？不多快好省地搞出工业体系，怎么搞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化？不搞农业工业化，如何大力发展农业？不大力发展农业，如何支援工业建设？不支援工业建设，如何……仲尼们牢牢掐着重工业这个咽喉，一有机会，就“下马项目”、“削减资金”、“少发货币”。要么直接卸掉你的胳膊，要么

堵住你的水源。重工业被牢牢遏制，整个经济也就随之跛脚前行。基层的无先锋们，工人群众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革命热情。即便如此，伟大的工人阶级还是干出了一番事业。带着镣铐也得斗争！

（但是，在所谓“职工过多”的问题上，无先锋又犯了一次之前犯过的错误。之前的错误，博友们参考《仲尼搅屎录（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10月至1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这次会议还提出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河蟹党屎》）

（前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的计划方式是生产的革命竞赛。而走资派们的方式则是物质奖励。是啊，不搞物质奖励，咋提高劳动积极性呢？

（会后，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72年因为文革小组阻挠没通过的，73年得以通过，力量此消彼涨。所谓经济计划，实际是政治任务。经济和政治，本身就是一回事。）

《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河蟹党屎》）

（收权、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绑住手脚，工资总额，涨不涨，什么时候涨，要看什么时候对资路线有利。工人作为主人，竟然管不了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河蟹党屎》）

（越多的工人参与管理，管理就越没有神秘感；越多的工人懂技术，技术员就没有神秘感；层级越森严，分工越明确，下层空间越狭窄，压迫越深重。）



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河蟹党屎》）

（工厂革委会被厂长负责制取代，无方力量被赶出管理机构。这本来是重大的反革命行径，但是文革派并没有及时组织反击。而企业党委成员，就是周恩来花一年时间，“大会小会逢会必讲，大报小报逢报必发”解放出来的干部，工厂的管理职位，则由下放回来的技术人员担任。力量此消彼长，往对无利的方向行进。）

金融系统也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9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华国锋听取汇报时，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正确认识银行的职能作用，对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来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加强银行工作的独立性，全国信贷资金统一调拨，全国统一结算，金、银、外汇统一管理。他们强调：当前银行管理偏松，要加强分口管理，不能乱来，否则一定要多发票子。（《河蟹党屎》）

（社会主义国家，本无金融可言。所谓金融，不过是国家财政系统的一个部分而已。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系统服务于国营的工商业系统。资本主义社会，金融是整个经济肌体的血液，掐住金融，肌体就得疲软，久了就要崩溃。社会主义社会，财政就是水源，没有财政的补充，企业就要失去活力。资控制了金融，便可以扶植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工厂单位，打压无路线的阵地。

（在恢复工作的资先锋队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面前，修正队员华国锋就和小学生一样无知。修正因为放下了阶级斗争，幻想什么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代表资无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小生产社会主义，结果就是根基不稳，东倒西歪。）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针对“三个突破”，国务院要求：大

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河蟹党屎》）

（不知道工友看到“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能不能看出字字血、声声泪来？在仲尼眼里，工人就是蝗虫，就是吃白饭的。）

为了解决粮食购销差额的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此外，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河蟹党屎》）

（仲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和风细雨，“知识分子不喜欢开长会，要长期教育”。对工人就是雷厉风行！“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这一招在大跃进的时候丫就使过了。无先锋本该在那时就组织反击，却白白错失了良机。这一次，居然还是没有像样的反搅屎措施。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我们看到，仲尼们死死掐住重工这个咽喉，然后又借口生产力跟不上，不能在农村快速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接着又借口农村生产力有限，不能供应城市人口足够的粮食，因此要削减职工人数，压缩工业规模；然后再借口工业生产力落后……如此恶性循环，工人不死也残。）

这些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精简职工方面，不但将1972年超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还动员了一部分1970年以来招收的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另外还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精简职工和城镇

人口后，1973年全社会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近956亿斤，做到了国内粮食收支平衡。（《河蟹党屎》）

（对待工人，一句话，“不合规定”，就“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对待专家，九一三后，翻身的专家，干部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驱逐工人，引进工贼。镇压造反派，扶植保皇派。这一进一出，工人贵族，工头监管，技术白专，厂长就在工厂中占了绝对上风！72年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因为姚文元的阻挠没有下发，73年就阻挡不住了。）

纵观这一阶段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五七干校、三线建设，无取得小胜；上山下乡，无准备不足，因而弊多於利。集体企业遍地开花，在无主导的形势下，要往国营方向推进，属于无的后备力量，同时是资无双方的一个争夺点。无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反击走资围绕“三个突破”所进行的搅屎上。如此一来，对于无产阶级的打击是三重的。首先，削减工人人口，压缩工业规模，这就从绝对力量上削弱了工人阶级；其次，在保留的工厂中，回调工人贵族，实行工头监管，扶植技术白专，搞厂长负责制，这些保守力量就在工厂中占了上风，从而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也被急剧削弱；最后，由于在工业领域斗争的失利，导致对于农村的生产关系改造、对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集体企业的进一步改造等等都缺乏有力的支撑，从而反过来对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巨大阻碍。

改开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神马南街村、华西村，统统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说，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企业的孤岛。那些鼓吹南街模式、华西模式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资逼，要么是不明就里的傻逼。

国营企业变成国资，也就是垄断资本。所谓垄断和自由竞争，不过是资本的一体两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只是资本的不同形式。好老板坏老板，都是一个藤上的瓜。哭爹喊娘的中小老板是大老板的外围。对于良心关注是左老板还是右老板，好老板还是坏老板，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多分了肉，俺们不感兴趣，只是搬马扎围观。怎么夺回被占有的剩余价值，搞掉所有黄四郎，才是俺们关心的。

还有神马“阶层划分”，也是很搞笑的划分方式。按照这种划分，中国有：

草领阶层、木领阶层、铁领阶层、铅领阶层、锌领阶层、铝领阶层、铜领阶层、锡领阶层、银领阶层、金领阶层、白金阶层、钻石阶层等 12 个阶层……一句话，只要不提人的社会性，不提资无阶级对立，就需要把人的自然性阶层化，15 个阶层不够，还可以搞 50 个，100 个沙粒级阶层，甚至 14 亿个纳米级阶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俱来地携带着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资无对抗中，不是老板压倒苦逼，就是苦逼压倒老板。什么恐怖袭击，民族冲突，极端分子，河蟹极力想极力掩盖的，都是阶级对立。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无辜的。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从自发到自觉。凝集更强大的力量，抛去小资幻想，准备战斗！



## 第十二章 经济战线的斗争（二）

---

前面说过，六六年底，工人进入早饭舞台。之前说的工人早饭派多为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合同工、临时工。俺们觉得，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允许合同工和临时工制度的存在，这是对专政的莫大侮辱！合同工、临时工们也觉着叔不能忍，于是纷纷起来早饭，成立全红总，直抵总工会，把个没有卵用的全国总工会闹了个天翻地覆。文革派迅速站队，果断对全红总表达了全力的支持。仲尼为首的走资集团自然不会坐等他们壮大，威胁到丫们的走资事业。于是资无双方就操蛋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搏杀。结果是在全红总激烈斗争下，总工会陷入瘫痪；而由于走资集团的奋力抵抗，合同工和临时工也没有获得单独组建造反组织的资格。

无先锋没有抓住机会，及时推进合同工、临时工等与正式工里的早饭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这本是无迅速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力量的一次良机，而且，此时的走资集团还未实现整合，正是迷糊之时，因此，无先锋应该坚持把合同工、临时工制度问题上升到全局性政治问题的高度，整合工人组织，给走资集团以致命一击。此后，也一直没能实现工人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而多半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走资派则在六七年七二〇之后迅速开始整合，无的力量越发处于下风。

林妹妹挂逼后，各路走资纷纷浮出，走资集团开始着手整顿，其中一个大动作是重建工（会）青（团）妇（联）；奇葩的是，老毛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也跟着当推手，搞神马大团结、大联合。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工人、青年、妇女，早就分裂成对立的派别了；所谓工青妇，就是块掩盖阶级矛盾的裹脚布。工人分裂为早饭派和保守派，青年、妇女，也都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阶级。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斗争，就是通过斗争，一派战胜另一派。搞工青妇，就是恢复走资派的机构，因此，实际上就压制了早饭派的斗争。如此一来，全红总的战斗成果几乎被损失殆尽，阶级力量的天平也明显地偏向了走资派。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河蟹党屎》）

（1966年11月底-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合同工，临时工，在文革初期头一次以组织形式发声。本来就是要大联合，搞专政嘛，不搞成全国性的组织，难道还要零敲碎打、各自为战么？可惜这个规模没保住，被资集团搅了屎，否则无疑会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工人组织。）

江青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河蟹党屎》）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文革小组站队支持“全红总”。哈哈，仲尼们对待知识分子、走资干部就是和风细雨，工资待遇一律照旧，顺带动一动去掉三高。对待工人，那就是：砍砍砍，踢踢踢，打打打。合同工，随时解雇；临时工，不听滚蛋。这尼玛竟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无产阶级被专政么？）

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

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家的支付。”（《河蟹党屎》）

（文革派直至问题核心：这不是神马方法问题，这完全是路线问题，这是搞资本主义！把你个劳动部长下放，去当当合同工，体验体验生活。河蟹现在不是有神马郭明义这样的工人代表么？丫一个不代表工人利益的代表，要他干嘛！）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河蟹党屎》）

（办公地点……所属单位……全国各地分团……劳动调配部门……最后是总工会。这一系列动作能完成，不正说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吗？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城市发生混乱，你知道要联系哪拨人，占领什么地方，专政什么人吗？全红总，战斗值爆表！）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

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河蟹党屎》）

（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老板，所在的市县领导人，也享受一下这种待遇？如此岂不是甚好？文革派号召：1. 大家都来早饭，要大联欢。2. 饭饭照吃，革命照干。）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河蟹党屎》）

（“‘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这就是力量。合法吗？无所谓，不愿意签，不签就走人，换个能签字的。

（社会主义就得铁饭碗。不搞铁饭碗，随时被人捏着蛋蛋，那还算是国家的主人么？）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

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河蟹党屎》）

（“有些地方将 1961 年-1963 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60 年到 63 年的工人数量，60 年 5044 万峰值，降到了 63 年 3293 万最低。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量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

（“大跃进”表明周仲尼的庸俗经济学路线已经不可能胜任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任，并走向反动。周仲尼变本加厉，索性借机打压无产阶级。尼玛对照苏联 30 年代的数据，周仲尼的经济管理水平真是低下啊！仲尼最为鲜活地给我们展示了，神马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仲尼搅屎录（九）》已经论述过仲尼在这个问题上的搅屎以及无先锋应对上的失误。

（“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我们就是要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以前吞了我的，现在都得吐回来！）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 1 月 20 日，周仲尼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仲尼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 1 月以及 1968 年的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河蟹党屎》）

（周仲尼出来表态：“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英特那啥熊要到社会主义后期，条件成熟了再实现。我们看到，“国务院”自始至终是彻头彻尾的走资大本营。）

1967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

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河蟹党屎》）

（“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按照原来办法执行”。走资们眼里，工人嘛，干活可以，千万不能组织起来。）

苏拉密眼里，这样雇佣农民工，又遣返农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喝农民血的罪证！同时我们也看到，所谓“毛时代”之类的历史概念是多么不适合拿来当一句话的主语。毛时代，那也是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从来没有神马“毛时代”如何如何。而只有“毛时代”走资们如何如何，走社们如何如何，早饭派如何如何，保守派如何如何。左逼右逼们都是半吊子，说话从来没有主语，只有个大箩筐一样的“XX时代”。

这次斗争，毛泽东及江青等无产阶级的领袖，未能敏锐意识到周仲尼之流的搅屎，未能牢牢的坚持把阶级斗争中“临时工合同工”问题提高到全局政治的高度，导致无产阶级基础在周仲尼的反扑下遭到打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全面夺权，彻底歼灭周仲尼之流的大好战机，却被以毛泽东江青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们白白错过了。

此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工人阶级专政，竟然连跨省的工人组织都没有，真是奇也怪哉。这么说也不对，后来仲尼们搞整顿，就重建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扒过，介个组织，俺们前面已经说了，丫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而是专政工人阶级的一个环节。此消彼长，一进一出，无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在这之后，无方真正的机会就只剩下了一次，那就是风庆轮事件。很可惜，这一把，又被玩砸了。从此，无彻底丧失机会。横亘在走资集团面前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剩下的，只有华不老实这样的修正势力，已然不足道哉。关于风庆轮事件，博友们可参看本博所贴心左同志的《风庆轮事件》一文。这个事件，可视为资无双方在经济战线的最后一次全面交锋。

我们说，阶级斗争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归根到底”很重要，不然就会把阶级力量对比的讨论庸俗化，抽象化。而且，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处于变动中的。我们扯一千道一万，都得落实到力量增长上，但是得具体落实，否则就没啥意义。斗争，永远是具体的斗争。力量弱，就要想方设

法去加强；而不是借口力量弱，就坐以待毙。任何时候，都要斗争。我们分析主客观情况，正确认识形势，是为了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寻找相应的斗争手段。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斗争形式。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只有正确认识了世界，我们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但认识始终服务于改造。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总结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打击对手的力量。这就是用对历史的认识来服务于现实的改造和斗争。如果结论只是：无的力量比资的力量弱，所以无失败了。这个结论就没有神马意义。失败必然是因为力量弱，但运动是绝对的；力量会随着具体的斗争而发生变化；错误的认识、行动，就会削弱力量，错误越大削弱越严重，反之，就会增长力量。文革开始的时候，资也犯错误，搞内斗，这个时候力量就削弱；在斗争中丫们逐渐清醒，抱团作战，力量增长。我们指出前辈们斗争的失误，绝不是为了神马指责，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历史功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我们是为了吸取教训，在现实的斗争中少犯同样的错误，否则，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甚至失败，我们说，这才是对革命前辈们最大的不敬。

